DOI: 10.6541/TJAH.202603_(60).0004

漫長的告別
——論作為話題的高士奇及其歷史形象

吳嘉龍*

【摘要】郭琇〈特參近臣〉是關於高士奇其人其行的諸多記載中影響最為廣泛的一種，其中對高士奇人品的評價，更是塑造了後世對高士奇人物形象的歷史認知。本文通過考察郭琇對高士奇的評價和高士奇歸隱前後的交遊，來說明其人在清初士人眼中的形象並非如想像中那般不堪。又根據對後世流傳的關於高士奇的傳記、筆記小說等史料所作的梳理，以及對這些史料形成過程的追溯，以清晰地呈現建構高士奇歷史形象的脈絡和形成因素。最後分析羅振玉的政治立場和其對高士奇展開的批判之間的關係，並闡明這種批判對後世書畫鑒藏史研究的影響及意義。

關鍵詞：高士奇、歷史形象、郭琇、羅振玉、書畫鑒藏

引言

> 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判斷一種文化依據的都是其佔統治地位的哲學，其智識階層盛行的潮流，這一潮流具體地在道德、政治、經濟和藝術上表現出來。①

就清初而言，或者更為具體地說，在康熙一朝的智識階層（Intellectual）中，若論及將本階層盛行之潮流擴展至書畫鑒藏領域的代表人物，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1645–1703）無疑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位。作為得享大名、顯於後世的書畫鑒藏家，高氏並非僅以其收藏之富、鑒定之精為世人所知，高氏的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輯

① 安·蘭德，〈致新知識分子〉，收入安·蘭德著，馮濤譯，《致新知識分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名、書藝和校書成就同樣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其可議的人品和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亦是自清初以降便令人談論不休的話題。

但這個話題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都只是以掌故的姿態存在於歷史之中，這固然是歷史環境的影響使然，正如魯迅所言：

> 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也使昧於掌故……②

可另一方面，這種「掌故家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淆亂了歷史的真容。而當掌故被視作歷史事實並為人們加以承認之後，就必然會對嚴肅的史學研究產生負面影響，此即「俗語不實，流為丹青」也。

將高士奇之人品納入史學研究的領域加以討論，乃始自羅振玉（1866–1940）。而羅氏謂高士奇以贋進上，有負於康熙帝（1654–1722）之知遇多矣，③ 更為後世論者所尊奉。有清一代，高士奇在君臣倫理一端，遭受的非議已然不少，即使後世學名遠播如羅振玉者，所作判斷亦不能免受此種物議之影響。如果考慮到羅氏的「遺老」身份，這該是情理中的事。可在羅振玉之後，服膺並光大其說的，多是些對羅氏之言全盤接受的書畫鑒定家。近來雖有一些專論此事的研究，但因之多聚焦於高士奇進贋行為之有無，且往往多猜測而乏實據，直至今日，高士奇進贋與否仍聚訟紛紜，未有定論，此遂成為一件公案。

在缺乏史料的情況下討論高士奇究竟是否曾向康熙帝進贋，顯然無法有效地推動相關研究的進展。就現有史料而言，更有可能解決的問題是：作為進贋說發起人的羅振玉為何會認為高士奇有進贋之實？而羅氏的觀點最初又是否作為一種學術觀點被提出？若欲探究這些問題，追溯高士奇歷史形象的演變，分析其產生變化之原因，就成了必行之事。不僅如此，釐清高士奇歷史形象的演

② 魯迅，〈買《小學大全》記〉，《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6卷，《且介亭雜文》，頁59。

③ 羅振玉，〈《江村書畫目》跋〉，收入高士奇，《江村書畫目》（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十三年《東方學會叢書》初集本），葉1a-b。按：此跋全文亦可參見羅振玉，〈《江村書畫目》跋〉，《松翁近稿（外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40-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既能深化對高氏其人的認識，也可以為往後進一步開展對高士奇進贗與否的研究奠定更為客觀的討論基礎。

而在回答了這一系列的問題之後，另一個問題自然也就會隨之出現：那些追隨羅振玉的當代書畫鑒定家為何會毫無保留地相信羅氏之言？明了其緣由，當是有必要的。

本文之作，意在分析高士奇在同時人眼中之評價，復考述後人對高氏其人歷史形象之塑造，並對在這一過程中，高氏的歷史形象發生各種轉變之緣由加以論說，力求為羅振玉所論之歷史淵源得一解釋。所考論者，則多聚焦於書畫鑒藏史以外之高氏形象。究其原因，乃是因為高士奇歷史形象的嬗變過程之實質，即是作為權宦的高氏之形象向外擴散和滲透的過程，而作為書畫鑒藏家的高氏之形象，只不過是從這一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副產品」而已。

文分六節：一者考述郭琇（號華野，1638–1715）所言高士奇「出身微賤」事與當時世風和政局之關係，兼述郭疏「官方化」之原因；二者考論高士奇歸隱平湖前後與當時名士之交誼；三者論述文網對高士奇形象塑造之影響；四者乃取高士奇詩文與其在傳記及說部文獻中之形象相互比勘，並追溯其形象嬗變之因果；五者敘述高士奇歷史形象最終成立之緣由；六者先探論羅振玉之政治立場與其對高士奇所作評價之關係，再述及其說之餘波。至於文中徵引之典籍，既有高士奇撰作之詩文，亦旁及時人之別集與實錄、年譜、信札、史傳、筆記及方志。所引史料不求其多，但求有裨於論述之周密，以補過往研究之闕略。

一、郭琇〈特參近臣〉發覆及其後事

關於高士奇其人其行，今日所見早期記載中最被奉為權威者，乃郭琇〈特參近臣〉一疏。是疏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時任左都御史郭琇向康熙帝進呈彈劾高士奇和王鴻緒（號儼齋，1645–1723）等大臣之奏疏者。疏中言及高士奇之相關內容如後：

> 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歲，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為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高士奇出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為生。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為士奇者，即當竭力奉公，以報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仰請皇上大奮乾斷，立賜罷斥，明正典刑……④

郭疏寫於同年九月十五日，題本亦在稍後進呈康熙帝。⑤ 在郭琇之描繪中，高士奇出身寒微，卻深受康熙帝賞識，後被破格選入南書房，可其不僅不思圖報，還犯下了結黨營私、操弄權柄、圖謀私利等罪。郭疏「文屬公牘，當可據」，⑥ 然郭琇所述因與彼時之世風及政局有千絲萬縷之聯繫，故非簡單視之便能索解。

孟森嘗論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詞科云：

> 據當時不滿於鴻博被舉者，一則曰門第，再則曰價值二十四兩，則似指為賄賂。以門第論，即三布衣中，朱竹垞固故相之後，嚴藕漁亦司寇之孫，其他名士多出世家。書籍之儲藏，耳目之濡染，所以能致鴻博者自有憑藉。而在聖祖之籠絡初定，亦正願收各地之人望，以縉紳子弟為先，所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者也。至二十四金之厚贄，究不得為賄賂，不過見其為非寒儉之流，而一時已播為口實，彌見世風之樸。⑦

蓋舉鴻博者，若非出身世家，則不免為人詬病。然重門第者，非獨鴻博一端爾。此是清初之世風使然，其時士人皆莫可置身事外。

---

④ 郭琇，《郭華野先生疏稿》（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雍正十三年刻本），卷1，葉11a-14b。

⑤ 明代對官員向皇帝所寫的報告作了比較嚴格的規定，報告公事者稱「題本」，報告私事者稱「奏本」。有清一代，則循明制。又，郭疏文末雖云「題本月十九日奉」（郭琇，《郭華野先生疏稿》，卷1，葉14b），但據後記「旨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該部知道」（郭琇，《郭華野先生疏稿》，卷1，葉15a），則是月十九日當係康熙帝諭令頒布之日期，未必意味著郭疏進呈康熙帝亦在是日。對九月十九日這一時間節點性質之說明，乃承匿名審稿人提示。

⑥ 孟森，〈己未詞科錄外錄〉，《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515。

⑦ 孟森，〈己未詞科錄外錄〉，頁5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陸隴其（1630–1692）《三魚堂日記》卷十所載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二十八日事：

> 沈樂存言高（引者按：即高士奇）之出身甚微，而其父則竟儼然入鄉賢也，世道可歎如此。⑧

沈樂存即沈愷曾（號樂存，1661–1709），康熙二十一年（1682）進士。沈氏世居歸安之竹墩，祖上多顯宦，為當地望族。⑨ 而郭疏曰高士奇「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為生」，和當時士人熟知之高氏早年經歷不合，⑩ 故郭琇所謂「高士奇出身微賤」或係攻訐高氏之表達策略。即使其確有所指，真實情形也當與沈愷曾所言高士奇之「出身甚微」相同，是就其門第而言。

復檢孟森《清史講義》：

> 帝（引者按：即康熙帝）於道學之外，亦重文藝，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間若徐乾學、高士奇，則以招權納賄聞，此即不講學者之有才不免無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於文史得盡其長，但不令在朝久處禁近而已。⑪

更兼郭琇劾高極力，高亦因此休致回籍，於是高氏心生絕意仕途、歸隱田園之念。此類文字屢見於其遭受彈劾後所撰之詩文題跋中，不贅。

後此二百餘年，其鄉人葛金烺（1837–1890）觀家藏高士奇自作山水一軸，乃有言曰：

---

⑧ 陸隴其撰，楊春俏點校，《三魚堂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10，頁277。

⑨ 沈愷曾之傳記，參見胡會恩，〈誥授奉直大夫掌河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三級又加四級沈公愷曾墓誌銘〉，收入錢儀吉纂，靳斯標點，《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54，頁1567-1569。

⑩ 尤侗便明確說過高士奇「少從夫子，長住京華」（尤侗，〈《獨旦集》序〉，收入高士奇，《獨旦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08上）。

⑪ 孟森，《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又按江村為郭華野所劾，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歸里，而是幅自題謂庚午所作，故詩中猶有不平之鳴。⑫

則高氏之心灰意冷、憤憤不平，後人亦有所感。

郭疏在遞呈皇帝之前，已為多人過目。⑬題本所載，事屬機密，卻難免洩漏，此蓋由題本制度之缺點導致。楊啟樵於此中緣由早有論述：

> 題本有兩個缺點：一是繁複遲緩，因規定用宋體字繕寫，須附有稱為「貼黃」的摘要，須備副本，須先由內閣審核擬旨，呈送皇帝核准後，復用滿漢文字謄清。手續過繁，自會耽擱誤事。二是洩漏機密，題本須由通政司轉送內閣，最後才上呈天子，過目者多，難免洩漏。⑭

由此，郭琇上疏彈劾高士奇、王鴻緒諸人，在短時間內便已成朝野俱知之事。其後不過兩年，陸隴其即從其族叔陸棻（字義山，1630–1699）處聽得關於此事之轉述：

> 義山叔言郭華野行取進京時，曾執贄於高。其參得勝也，實由皇上先有驅除之意，曾密商之高，高漏之於徐（引者按：即徐乾學〔號東海，1631–1694〕），徐即使郭參焉。徐又素惡王之與爭利，復使郭參之。郭商之高，高素與王密，力言不可。郭復與徐謀，并高參之，而高、郭之交遂絕。徐與高亦陽合而中離，而王、高之交則愈固。徐之初得氣也，亦重賂高而借其力。

---

⑫ 葛金烺纂輯，《愛日吟廬書畫錄》，《歷代書畫錄輯刊》，第1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卷3，頁198。

⑬ 匿名審稿人亦言及題本進呈皇帝之完整流程，並指出：「無論如何，康熙皇帝理應不是第一位，更不是唯一一位看到該奏疏內容的人。」

⑭ 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增訂第三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56。按：宮崎市定亦對題本作過簡要的敘述，「普通的奏章採用題本的形式上奏，經由通政司呈遞給天子，再由中央政府即六部、內閣公開處理」。（宮崎市定，〈雍正硃批諭旨解題—その史料的価値—〉，《宮崎市定全集14：雍正帝》〔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言高微時所執贄之朝臣，有反執贄於彼者。又言傅之參崑山也，王有力焉。⑮

李光地（1642–1718）所述此事始末雖有所出入，然言及高、王與徐、郭關係之變化，亦大略如此。⑯

又考鈕琇（？–1704）《臨野堂集》卷二，見是卷所收〈為徐司寇與王司農求婚啟〉正文後有其附記一則曰：

儼齋為東海門下士，是時偶有蔚懟，故「棲遲」一聯及「竹館芳林」數語，皆是司寇手自增入。⑰

「偶有蔚懟」云云，語極隱晦，然所指為徐乾學使郭琇上疏彈劾高士奇、王鴻緒諸人之事，必無可疑。

合三家記述以觀之，高、王為郭所劾，定是徐之謀也。

高士奇、王鴻緒和陳元龍（1652–1736）等人悉遭罷斥，固是徐乾學一黨內訌之結果，⑱ 然此不過是表象而已，其實質乃康熙帝政治需求悄然變化之反映。高、王輩去職之後，徐亦失勢，即是明證。鄧之誠云：「黨爭固烈，而操縱者人主也。」⑲ 甚是。

復見啓功言：

當政本漸固之時，即竹垞為用日輕之際，不待高淡人之傾軋，南書房已無可留之地焉。自古文人莫能自立，必憑附政局而為進退。⑳

⑮ 陸隴其撰，楊春俏點校，《三魚堂日記》，頁277。

⑯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收入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 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4，頁739-741。

⑰ 鈕琇，《臨野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2，頁12上。

⑱ 王家儉，〈崑山三徐與清初政治〉，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720。

⑲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940。

⑳ 啓功，〈朱竹垞《梧月詞敘》手稿跋〉，《啓功叢稿：題跋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名列「江南三布衣」之朱彝尊（號竹垞，1629–1709）尚且如此命運，「出身微賤」之高士奇又豈能例外？

流言最是可畏，黨爭之事人盡皆知之後，㉑ 郭琇所列高、王等人之罪狀即成為後世敷演傳聞之重要資源。可郭疏所言雖大抵屬實，但作為獨立文本，畢竟只是一家之言，並不具備權威性。其後來為官方所認可，乃至被賦予權威之地位，實是經由乾隆帝（1711–1799）之意志加以推動所致。

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乾隆帝責令國史館，務必將郭疏的內容悉數載入其所彈劾的大臣之列傳中：

> 夫王鴻緒、高士奇與明珠、徐乾學諸人，當時互為黨援，交通營納，眾所共知。……是郭琇原疏於諸人被劾款蹟，皆當據事直書，不必稍為刪節，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王鴻緒輩之罪狀如此，郭琇之鯁直如此，其後之自取罪戾如此，並敬悉我皇祖之仁智並用、措置得中又如此，既可令海內傳為美談，且足令朝臣共知鑒戒。其於世道人心甚為有益，何必曲存隱諱乎？……著交該館總裁，將王鴻緒、徐乾學、高士奇等列傳覆加覈訂，所有郭琇原劾諸疏悉載入傳內，另繕呈覽。㉒

乾隆帝反問國史館諸臣在修訂這些大臣之列傳時「何必曲存隱諱乎」，㉓便從側面反映出此前國史館在編纂傳記時隱去了相關內容的事實，而史臣們的

㉑ 本文所言「黨爭」之「黨」，非「南北黨」之「黨」，而是「結黨營私」之「黨」。因為自陳名夏「南黨」案後，所謂的「南黨」在實際上便已不存在了。

㉒ 《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21冊，卷979，頁73下-74上。按：乾隆帝的這道諭令，後為四庫館臣載入《四庫全書總目》之中：「嗣復命於王鴻緒、高士奇、徐乾學諸傳中補載琇之劾疏，毋庸隱諱。竝復頒示綸音，闡明其進退之由。」（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55，頁501下。）又，根據王彩雲的研究，國史館的規模在乾隆年間得到了進一步擴大，而且「列傳寫完後乾隆皇帝還要親自過目，不合要求之處令史臣修改」（王彩雲，〈《滿漢名臣傳》的版本及其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3年3期，頁48）。對國史館歷史沿革及其傳記寫作對象的論述，則可參見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頁30-31。

㉓ 國史館於乾隆三十年（1765）重開，以修訂和續寫臣工傳記（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頁31），故知彼時國史館是在修訂而非編纂這些清初大臣的傳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機，則應當是為了維護康熙帝作為聖明之君的形象。蓋順、康之時，為鞏固政權計，官方對漢族士人多行籠絡政策（按：前述之己未詞科亦是，且康熙帝意在「消弭忠明士人的反清意志」㉔）；而至乾隆朝，人皆不知其時情形，以為康熙帝優容臣屬有損形象。但既然當時關於高士奇等人結黨營私之傳聞已經流傳開來，甚至出現了「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的歌謠，㉕ 故此雖為無據之謠傳、匿名之蜚語，㉖ 然若是官方執意隱瞞，則有弄巧成拙之弊。更何況在乾隆帝看來，這種編纂方式也不符合懲惡揚善的原則，不能起到昭傳後世的作用。㉗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通過乾隆帝的授意，郭琇對高士奇形象的描繪才開始進入到官方認可的歷史敘事之中。

二、高士奇與「當時自好之士夫」

康熙一朝述論高士奇弄權結黨者，僅見陸隴其《三魚堂日記》、李光地《榕村續語錄》等書中所載之隻言片語。蓋高士奇遭劾事雖為人所津津樂道，然因此事牽連甚眾，又涉人隱私，故彼時之士大夫於詩文集中罕為記述。雖偶有述及者，亦是無意示人之私人寫作。揆諸傳統士人之操守行事，後世史家作出「以士奇之人品，當時自好之士夫，固應避之若浼」之論並不足怪，㉘ 可此言不過是出乎情理而發，若考諸高士奇罷歸平湖前後之交遊，則知此論未得其實。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一二月間，冒襄（1611–1693）便遣其子冒嘉穗（1635–？）往平湖拜訪高士奇，冒襄另有索詩書信一封及金玥（1650–1703）所繪畫冊附上，㉙ 冒、高之交頗為投契，已可推見。是年五月，嚴繩孫（1623–

㉔ 陳捷先，《康熙大帝：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皇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74。

㉕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10，頁687。

㉖ 有關考證參見孟森，〈己未詞科錄外錄〉，頁515。

㉗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頁31。

㉘ 孟森，〈己未詞科錄外錄〉，頁505。

㉙ 吳嘉龍，〈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中國四庫學》，第15輯（長沙：岳麓書社，2025），頁2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02）亦至平湖，並為高士奇自藏禹之鼎（1647–1716）繪製之《蔬香圖》題詩，二人就此互有唱和。㉚ 同年秋，高士奇生日，毛奇齡（1623–1713）則寄自書幛子以贈。㉛ 時去高士奇離京歸隱不過一年，故知當世之名士如冒、嚴、毛者，並不避忌與高氏相交。

前述之陸菜亦是高士奇交遊網絡中之一員。陸菜於己未詞科時舉鴻博試一等，改翰林院編修，充《明史》纂修官。㉜ 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十五日夜，高士奇招陸菜飲。㉝ 此為今見高氏與陸菜相與過從之最早記載，然二人定交乃在此前。

康熙三十六年（1697），高士奇序陸菜《雅坪文藁》云：

> 余交學士三十餘年，常以文事相切劘…… ㉞

由此推知二人相識實在康熙十七年前之十餘年，即康熙初年時。陸氏雖「幼遭兵燹，轉徙流離」，㉟ 然其彼時行蹟卻並非晦暗難明：

> 公（引者按：即陸菜）幼孝友，年十四，值江南初下，王師之分徇者，略平湖而東，公父未庵公為鑲黃旗帶子阿什兔所俘，夾鈹于項間，公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公而俘公至京。誠順伯者，阿什兔主人也，馬姓，為固山，見公異之，試以文，大喜，命拜為父子，而使其諸子為兄弟。會永平舉人李茂春授生徒于遷安之龍起寺，公與馬氏往受學。……適公兄世楷以開科選貢，廷試于天安門外，除平陽府通判，尋公于李舉人家，會之他

㉚ 吳嘉龍，〈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頁286。

㉛ 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頁389。

㉜ 秦瀛，《己未詞科錄》，《續修四庫全書》，第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2，頁140上。

㉝ 胡春麗，〈《高士奇年譜》補正〉，《中國詩學研究》，第21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22），頁228。

㉞ 高士奇，〈《雅坪文藁》序〉，收入陸菜，《雅坪文藁》（上海圖書館藏康熙三十六年刻本），葉1b。

㉟ 朱彝尊，〈《雅坪詩藁》序〉，收入陸菜，《雅坪詩藁》（上海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七年刻本），葉1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寺。而公父未庵公又以丙戌中式赴公車門，親詣誠順伯里第，乞放公歸，許之。乃以世枋名補平湖諸生。

……公自分守家讀父書，徒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今名，援例入國學。及赴考，即以高等授內弘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赴任。而誠順伯適于是年寢疾卒，公為侍湯藥，奉含斂，疏麻服喪。……乃復以國學挾中書銜舉順天鄉試，聯捷，登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為原官。㊱

此為固山之馬氏者，即馬光遠（？–1663）。馬氏籍貫順天府大興縣，順治四年（1647）告老還鄉，康熙二年（1663）病卒於家。㊲ 此前高士奇不出杭州，陸菜亦守家讀書，而高氏北上赴京在康熙三年（1664）三月，㊳ 故二人相識並定交之時段，當在此後至康熙六年之前的數年間。

方薰（1736–1799）曾言：「康熙間，士人居家恒多友文墨，讀古書，挹揚風雅者。」㊴ 高士奇和陸菜既然「常以文事相切劘」，那麼二人當同屬彼時北京文人交遊圈，則二人之定交，應是此種風氣薰染之自然結果。

康熙十八年冬，高士奇作〈東陸義山編修〉一題二首贈陸菜：

日夕疲羸馬，難忘陸浚儀。蘭荃敦舊好，月露絕支詞。旅舍層城隔，官身下直遲。良宵堪剪燭，相約細論詩。

又：

班范千秋業，期君意獨深。臨毫花在腕，把臂雪為襟。好勸杯中蟻，同翻帙內蟫。青松任風雨，不改歲寒心。㊵

㊱ 毛奇齡，〈神道碑銘二·皇清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雅坪陸公神道碑銘〉，《西河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27上-下。

㊲ 馬光遠之傳記，參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79，頁6524-6525。

㊳ 吳嘉龍，〈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頁260。

㊴ 方薰，《山靜居詩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咸豐六年《別下齋叢書》續刻本），葉2b。

㊵ 高士奇，《苑西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頁387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良宵堪剪燭，相約細論詩」，此為高氏引陸菜為詩友之明證；「班范千秋業，期君意獨深」，則可見高士奇深許陸氏之才學，勖勉之意一望可知；「青松任風雨，不改歲寒心」，正是二人交誼深厚之真情流露。

高、陸相交之久，情誼之深，往來之多，關係極為親密，未曾因高氏被劾而有所變易。除此以外，二人酬唱亦復不少。

陸菜《雅坪詩藁》刊刻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集中屢見投贈高士奇之詩作，所涉時段涵蓋高氏在京之日及歸田之後，跨度極長。

《雅坪詩藁》卷二十〈送高澹人侍讀〉：

> 萬騎臨遼海，連雲柳岸長。山圍靈寢緑，花點御鞍香。委珮趨輪殿，庚歌繼柏梁。空慚留滯者，遥憶紫遊韁。㊶

詩中所言乃康熙二十年（1681）高氏扈從出巡事。至於陸氏對高士奇深得寵眷而無嫉妒之心，亦可從詩中得見，此非情誼之篤不能淡然處之。

後陸菜於康熙二十一年乞假南歸，㊷ 離京則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正月十三日。㊸ 離別之際，高士奇作詩以贈。時陸氏喜得一子，二人訂有結鄰之約：

> 九衢燈火暗，驛路柳條新。去就渾難事，聲華豈戀人。畫船籠翡翠，繡褓護麒麟。（時義山新得子。）好作松筠計，春醪勸獨頻。

又：

> 吾亦思鄉久，言歸恨每遲。灌園堪自適，對宇早相期。竹裏開泉脈，花間理釣絲。為尋五畝宅，鷗鷺莫教疑。㊹

㊶ 陸菜，《雅坪詩藁》，卷20，葉17b-18a。
㊷ 毛奇齡，〈神道碑銘二·皇清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雅坪陸公神道碑銘〉，頁128上。
㊸ 陸菜，《雅坪詩藁》，卷21，葉1a-b。
㊹ 高士奇，《苑西集》，卷4，頁400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棻歸鄉之後，高氏甚是思念故人，故有於半年之內作書三通致陸氏之舉：

長安寥闊愁鴻魚，半載三接長安書。㊺

陸棻為平湖人，高士奇退居平湖之後，二人過從更密。其間或是陸棻應高士奇之招赴北墅賞花，㊻或是高士奇受陸棻之邀出遊，泛舟東湖：

湖波漾朝曦，放棹凌青滀。甫滌塵闤氛，悠然烟水窟。雨餘九峯朗，淡遠勝岌崒。春氣殊未深，天風負微慄。躡履浮圖顛，頗忘此衰疾。同升昔所願，絲斷豈成疋。銀漢如可通，靈槎渺相失。形骸據稿梧，襟期報戰栗。七載菰蘆人，偃息以終日。野菜挑復滋，畦韭剪方茁。閒情魚鳥親，孤影蘿竹暱。朔雲賦招隱，懷袖盈尺一。爛爛晴霞映，涌涌秋潮溢。故園忽聚首，晤對眼如漆。驊騮斂駿步，策贈駘駑質。契結蘭臭二，眷悵竹林七。且盡掌內卮，漫理箱中帙。金臺乍歸隗，華山復拘逸。愧非書畫船，濡爾鏤管筆。倚舷不能和，神贍信多術。並坐舴艋中，俛若環堵室。烹無磐谷釣，釀乏柴桑秫。世事如秕糠，隻手難盥櫛。敢携畚鍤先，速待醴泉出。麴車中聖人，藜杖續太乙。二方喜偕遊，芝玉自成匹。飛絮將化萍，終焉喪其實。寒燠非違時，鐘呂各應律。促裝重踟躕，歸期先自必。北墅多賞心，吾廬亦容膝。（時余將理北行裝。）㊼

陸棻賦此長詩，實是為敘別情而作。毛奇齡記陸棻仕履，云「會是年庚午舉鄉試，即命公為福建正主考官」，㊽「庚午」乃康熙二十九年，陸氏所謂「時余將理北行裝」，即指此也。復考高士奇《歸田集》，知泛舟東湖在是年春二月，而高氏二子輿、軒亦在。㊾親厚如高、陸兩家者，實不多見。

㊺ 陸棻，《雅坪詩藁》，卷15，葉12a。按：高士奇有書齋名「三釜軒」，故詩題之「三釜」，即指高氏也。

㊻ 陸棻，《雅坪詩藁》，卷30，葉12b-13a；陸棻，《雅坪詩藁》，卷40，葉31b-32a。

㊼ 陸棻，《雅坪詩藁》，卷8，葉7a-8a。

㊽ 毛奇齡，〈神道碑銘二·皇清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雅坪陸公神道碑銘〉，頁128上。

㊾ 高士奇，《歸田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頁173上-下。按：此詩前有〈花朝過北墅〉一題，故知泛舟東湖亦為是年春二月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湖諸陸之中，陸棻一支「世官累爵，門閥冠西浙」，㊿ 更和同樣世居平湖之望族沈氏互為姻親。51 高士奇落籍平湖，為平湖高氏始祖，其後高氏根基之奠定，社會網絡之融入，52 或多得陸氏之助耶？

《雅坪詩藁》卷八有〈寄贈詹事高澹人〉一題。此詩足見彼此襟懷，故不避繁冗，特為過錄：

> 載遡春明居，蕭寂牽組綬。達夫素心者，銅馬快携手。既為禁省臣，尚復許儕偶。觴咏以時叙，連床聽清漏。自分樗散材，榱椽力難負。逡巡痼疾嬰，載言返東畝。遂與閭闔辭，違我金石友。河淮戒奔峭，繫艇柴門柳。老杉繚南榮，新鶯轉北牖。觀象思義前，檢方得肘後。有屐不敢蠟，登山畏其陡。雖不廢嘯歌，唱和向誰某。悠悠念故人，燕雲幾驤首。尺素通殷勤，未慰調饑久。早春翠華臨，西泠賞清瀏。文字通二典，補助踵三后。扈蹕如雲從，先生實左右。伏謁在道周，跪拜逐童叟。因之叙契闊，見必已申酉。流連吐哺餘，嘆嗟墨翟守。影埋澗底碓，形拂坐中帚。貽我以兼金，俾得飽藜糗。捧金益增慨，奚啻十瓊玖。記余杜門來，敝裘七解紐。庭際悲鉏蘭，房中夢炊臼。稿項厭巾領，癡骨委林藪。知交盡落落，勿更掛臧否。苕華西子妍，疇顧嫫母醜。蹀躞神駿馳，寧策駑駘走。惠此空谷音，感激以敦厚。詰朝聞迴鑾，移檣疾驅牡。無由攀去纜，一宿剪畦韭。竊喜辟疆園。近結柘湖口，終當賦嚶鳴。白雲共徂耦。寄書北鄉雁，愁懷藉良剖。毋嗤徑寸莛，傾耳洪鐘扣。53

陸棻表兄乃朱彝尊。54 朱氏之「美貶」，為其人生中一大挫折。此事雖有高士奇暗中推動，55 然朱、高二人此後仍有交往。張宗友認為，朱氏此種態度：

㊿ 毛奇齡，〈神道碑銘二·皇清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雅坪陸公神道碑銘〉，頁127上。

51 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58。

52 潘光旦指出：「高氏初籍錢塘，至士奇始於平湖境內構江邨草堂居住。兒子輿仍以錢塘籍貫應科舉……似乎到岱的一世，纔完全算平湖人。」(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頁49。)

53 陸棻，《雅坪詩藁》，卷8，葉3a-4a。

54 朱彝尊在為陸棻《雅坪詩藁》所作序中徑稱陸氏為「表弟」(朱彝尊，〈《雅坪詩藁》序〉，葉1a)，二人之親屬關係由此可知。

55 有關考證參見張宗友，〈文士之交與祿利之爭：朱彝尊「美貶」考〉，《古典文獻研究》，第23輯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頁218-223。按：鄧之誠在評價此後二人的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方面說明朱彝尊的確如顧炎武所品鑒之「宅心和厚」，寬以待人，另一方面也說明其志并不在為官，所謀者大。[56]

無論朱彝尊之心路歷程和個人考慮到底如何，其後來與高氏過從仍密，乃是不爭的事實。

前舉諸人均可以「當時自好之士夫」目之，諸公於高士奇退居平湖之後仍與之交遊不輟，正能作為彼時士人如何看待高氏其人之參照。[57] 人與人之交往，其實質是彼此間之挑選與被挑選，個中動機多種多樣，或因治學，或因謀食，或因情誼，若只從道德一端審視，則未免想當然爾。更何況，不同人所秉持之道德標準並不一致。而以高士奇罷官之後的交遊言之，當時不少名士與其繼續往來，不過是人之常情而已。「朝代更替所引發起政治上的波動，在一般情況下，並未給士人間的交往帶來極大的衝擊」，[58] 易代之巨變尚且如此，餘者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之，高士奇這些交遊的片段恰恰反映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人與人之交往雖然常常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必須面臨抉擇和改變，但出於道德的判斷卻並非是這其中唯一的一種，更不是最為重要的一種。

三、被控制的知識與不受控制的想像

既然高士奇在清初士人眼中並非負面人物，那麼其風評無礙於高氏成為當時書畫鑒藏界中一大權威，正在情理之中。石守謙在述及清初文人繪畫之環境時，已勾勒出關於此情形的面貌之一端：

往時也提到了朱彝尊的和厚性情是這段關係得以維持的原因：「後康熙庚辰，竹垞過當湖，澹人招飲，采風班演《黨人碑》。竹垞固和厚，澹人亦何地自容耶！」（鄧之誠著，欒保群校點，《骨董瑣記全編：新校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235。）

[56] 張宗友，〈文士之交與祿利之爭：朱彝尊「美貶」考〉，頁225。

[57] 承匿名審稿人提示，高士奇在時人眼中並非負面人物，當對他後來的起復有一定作用。

[58] 謝正光，〈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頁22-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到了清代政權建立之後，有了關鍵性的質變。由於戰爭及戰爭之後秩序重建工作的展開，造就了一個新的有權勢的貴宦階級，而且因為清政府運用文化手段以鞏固外來政權之地位，這些政治上的權勢階層遂與文化產生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同時具有支配文化事務的權能。
如果僅就繪畫的範圍來看，清初的大收藏家及重要的美術贊持者幾乎全為這種人物。宋犖在其〈論畫絕句〉中點到的當代重要鑒賞家如孫承澤（侍郎）、梁清標（相國）、卞永譽（中丞）、高士奇（詹事）、周亮工（侍郎）、曹溶（侍郎）都是政府的高官權臣，連他自己亦是久任地方大吏，頗得皇帝的寵信……當時的畫家也確實與這班文化權貴有密切的來往……[59]

宋犖（1634–1713）是使高士奇書畫鑒賞家地位得以初步確立的重要推手，[60] 宋氏對高士奇此項才能之推許，隨著《江村銷夏錄》之流佈而得到印證，並廣為人知。就此而言，高士奇和《江村銷夏錄》乃是互相成就的關係。[61] 高氏於此端之聲望，至乾、嘉時亦已溢出到了書畫鑒藏界以外，嗣後更演化形成社會上的一種普遍印象。與此同時，作為權宦的高氏形象之敷演，卻是另一番情形。

如前所述，高士奇的歷史形象在乾隆帝本人的意志主導下得以定性，但其過程卻甚是漫長。因為從郭琇將奏疏進呈給康熙帝，再到其內容被官方承認，成為「政治正確」的一部分，已過去了近百年。而在這段空白期中，民間也出現了對高士奇形象的演繹，年羹堯（1679–1726）的幕僚汪景祺（1672–1726）即是這其中較早者。

汪景祺在其所撰的《讀書堂西征隨筆》中如此評價高氏：

索額圖死於宗人府，籍沒貲財，全家受禍，皆高為之。索以椒房之親，且又世貴，待士大夫尚不以禮，況高是其家奴狎友……索則直斥其名，有不如意處則跪之於庭而醜詆之，高遂頓忘舊恩……高始也因索以得官，旋合明以傾

---

[59] 石守謙，〈石濤、王原祁合作《蘭竹圖》的問題〉，《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391。

[60] 吳嘉龍，〈出版、閱讀與知識傳播——以《江村銷夏錄》為個案的研究〉，《中國出版史研究》，2023年2期，頁81-83。

[61] 有關論述參見吳嘉龍，〈論《江村銷夏錄》之流傳與閱讀〉，《中國書畫研究集刊》，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頁8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索，又合徐以傾明，又合明、王（鴻緒）以傾徐。市井小人，出自糞土，致身軒冕，烏知所謂禮義廉恥者哉！㊷

可汪氏所述，如高士奇入侍內廷之經過，實乃不確之言，劉建新在其為《清代人物傳稿》所撰的高士奇傳記中對此已有辨析。劉氏在引用《歸田集》中詩注「余以儒生蒙召對特用，不由大臣薦引，上每憐余孤植」後，㊸ 特別指出：

> 《歸田集》刊行於康熙三十六年前後，明珠、索額圖等人當時均在世。另外，此事還涉及到康熙本人，高士奇當不敢憑空捏造「不由大臣薦引」，「蒙召〔對〕特用」的經過。㊹

按高輿（1668–1717）《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正一品又加二級顯考澹人府君行述》和高士奇《隨輦集》卷一所載謝恩詩所言，高士奇步入仕途，是在他進入太學就讀之後，因其擅長的書風與康熙帝的審美趣味相契合，才得以在康熙十年（1671）被選派參加禮部和翰林院組織的考試，㊺ 並「蒙恩考取留翰林院辦事」。㊻ 故高士奇「 因索以得官」一事，確非事實。汪書所載乃其「自邢州取道晉陽、河東入潼關至雍州，凡路之所經、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談」者，㊼ 則書中對高士奇所作的描繪顯然是傳聞的一種變形。

㊷ 汪景祺，〈高文恪遺事〉，《讀書堂西征隨筆》，《續修四庫全書》，第117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276上-276下。

㊸ 高士奇，《歸田集》，卷8，頁216上。

㊹ 劉建新，〈高士奇〉，收入王思治、李鴻彬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179注釋⑯。按：劉氏引文有脫漏，今據原書補，所補文字用六角括號標出。

㊺ 高輿，《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正一品又加二級顯考澹人府君行述》（國家圖書館藏清沈氏啸園藍格抄本），原書無頁碼。

㊻ 高士奇，《隨輦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頁461上。

㊼ 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序〉，《讀書堂西征隨筆》，頁258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讀書堂西征隨筆》的稿本於雍正三年（1725）被抄沒入宮，雍正帝（1678–1735）讀後斥之為「悖謬狂亂，至於此極」，[68] 其書在之後的兩百年間亦未見傳佈。民國十六年（1927），這部稿本在故宮博物院內的懋勤殿被發現，次年即以鉛印線裝的複製形式收入《掌故叢編》第一輯並刊行於世，這也是民國以降《讀書堂西征隨筆》為人所知的開始。換言之，在有清一代，汪書的內容並不為民間所知。可儘管汪景祺所描繪的高士奇形象未在整個清代產生影響，但其內容卻可以證明，關於高士奇其人其行的傳聞在他身後極為短暫的一段時期裏，就開始和當時人所共知的一些時事軼聞相混雜，並形成了新的面貌。

在乾隆帝本人干預了國史館對這批大臣列傳所作的書寫之後，庶民階層（Non-elite Groups）對這些本朝人物的看法卻依然如故，甚至還有更為複雜和離奇的面貌從中衍生而出。這是因為乾隆帝雖已對高士奇等人進行定性，可郭疏的內容知者極少，而乾隆帝的評價並未公之於眾。

郭疏所載之所以罕為人知，乃是和《郭華野先生疏稿》的刻本之流傳關係密切。此書在清代於雍正和乾隆年間皆有刊刻，然均是山東即墨郭氏家刻本。以私家刻書的慣例而言，一次最多印行數十部才是比較正常的數量，故一般人得見此書的概率不大。而四庫全書館修書時所據《郭華野先生疏稿》之底本，即《四庫全書總目》注明為「山東巡撫採進本」者，[69] 乃一抄本，[70] 更充分說明了當時此書之刻本不僅刷印數量不多，就連流通範圍也不甚廣。

至於乾隆帝為何不將其所作評價公之於眾，則有兩個層面的原因：一是因為需要貫徹乾隆帝意志的是其臣屬，而非庶民階層；二是因為清代這兩百餘年裏，在針對科舉考試所實行的教育中，歷史知識受到了普遍的漠視，加之官方

---

[68] 雍正，〈題《讀書堂西征隨筆》〉，收入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續修四庫全書》，第1177冊，頁257下。

[69]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55，頁501中。

[70] 檢《郭華野先生疏稿》抄本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二本皆名「華野疏稿」），見刻本中如《特參近臣》等疏，二本均於標題後添一「疏」字，作「某某疏」，其中抄本各疏標題後之「疏」字乃後添，則抄本必據刻本抄出。除文字相同之外，此抄本首葉又有後添之「欽定四庫全書」六字，則其為《四庫全書》底本，便絕無可疑。而抄本中之「疏」字並非抄寫者所加，當是與同葉「華野疏稿」、「欽定四庫全書」等文字一樣，均係四庫館臣所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涉及本朝歷史之知識的傳播採取了十分嚴格的控制，因而也就使得許多下層讀書人對此懵然不知。[71]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開始實行改革，此即「清末新政」。科舉制亦在改革之列，彼時在科舉考試中已經開始強調「中國政治史事論」這類涉及本朝歷史的內容了。不過，對當時大多數的讀書人而言，這一改革並沒有對他們的知識世界產生重要的影響。

錢穆出生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並在十歲時進入無錫本地的新式小學果育學校讀書，這時已是光緒三十年（1904）了。錢氏在《師友雜憶》中回憶說，他進入果育學校讀書後，有一天：

> 伯圭師隨又告余，「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余驟聞，大驚訝，云：「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云：「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你看街上店鋪有滿漢云云字樣，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觀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師啟之。[72]

由此可見，即使在江南富庶之地，若無人教導，一般孩童對滿漢之別也是一無所知的。在此情形下，他們對本朝歷史能有多少了解，更是不言而喻。

如果說孩童是一張白紙，不了解這些歷史知識也是情有可原，那麼在成人，甚至是居住在北京的滿人之中，其歷史知識及受之塑造而成的民族觀念就一定非常強烈嗎？答案當然也是否定的。

如老舍在談及《茶館》的立意和構想時就說：

> 清末，民族觀念也不太重，旗人窮了，又失去了人心。茶館中，民族分歧不大。那是旗人最掙扎、最混亂的時候，不勞動、沒本事的人就完了。[73]

---

[71] 有關清代下層讀書人缺乏歷史知識的論述，參見曹南屏，〈清代科舉的知識規劃、考試實踐與士子群體的知識養成〉，《學術月刊》，2017年9期，頁154-158。

[72] 錢穆，《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第51冊，頁36。

[73] 《北京人藝1957年排練記錄手稿》，轉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頁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是人們的歷史記憶被清代統治者刻意抹去所導致的，「歷史記憶中斷使得最簡單的事實都可能被徹底遺忘」，[74] 正是其負面影響之體現。

儘管根據沈松僑的研究，「在晚清的國族建構過程中，種族論述實在是佔據著主導性的霸權地位」，[75] 但直至二十世紀初，究竟應以文化還是血緣來界定「民族」，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仍是相當曖昧的。[76] 正因彼時「國族意識」尚處於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醞釀、擴散的階段，故對庶民階層而言，他們雖然明白滿、漢之別，但對其中更深層次的歷史淵源卻很難有所認識。這也就意味著，從清末新政的結果看來，那些對本朝歷史之知識有著深入了解的晚清人，其實只是個人數很少的群體。而在此之前，即便郭疏的內容已進入到了官方的歷史敘事中，它仍舊無法在民間產生重要的影響，官方當然也就遑論能去遏止，乃至控制人們對這些歷史人物軼事的想像。一旦想像的潘多拉魔盒打開，荒誕的劇目便會接連上演。[77]

官方對涉及本朝歷史之知識的傳播進行嚴格控制是一方面，而人們的自我禁抑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78] 清代下層讀書人無甚關於本朝歷史的知識，固然和官方對這些歷史知識的刻意控制有關。然至乾隆中葉時，下層讀書人多專意科舉，不讀古書，更是主動地順應了這種控制。在面臨這種自上而下施加的政治壓力時，他們由下往上回應這股政治壓力的做法，就是不讀古書、不作學問，只一心鑽進科舉考試中去。這種不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固然不會給自身帶來危險，但同時也讓他們在主觀上採取了對本朝歷史之知識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就和官方刻意的控制一起，最大限度地讓人們保持了緘默。就像王汎森所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這時『下有對策』的結果，往往是擴

---

[74]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407。

[75]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期（1997.12），頁52。

[76]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51。

[77] 不過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會早於作為文網漸馳之開端的嘉慶帝統治後期。

[78] 有關這種現象的全面論述，參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375-4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了官方政策的影響。」[79] 可還有一部分讀書人，他們雖然對這些歷史知識有一定的了解，但卻又是不敢談、不敢寫的。亦是因此，後世描繪高士奇生平事蹟及其言行之記載，才多見於說部文獻。

饒是如此，關於高士奇形象嬗變的兩條脈絡還是已經清晰地顯現了出來。它們一條屬於官方，另一條則屬於民間，但二者彼此之間卻並無交集。甚至如果一切都按照清代統治者的預想發展下去，它們可能永不相遇。可只要民間還存在著涉及此事的零星片段，人們便會利用他們所能搜集到的一切信息，在自己的知識體系內將之重組，以此來完善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這生動地證明了一點——在一個官方嚴格控制知識和思想之傳播的時代，人們便會巧妙地通過他們特有的方式去獲得他們想要了解的一切，即使這些捕風捉影的想像與事實相去甚遠。

四、傳聞的虛構與歷史的真實

晚清時，官方對國史館的管理漸趨鬆弛，與此同時，許多官方檔案也流落到了民間，記載郭疏內容的那批大臣列傳之抄本亦在其中（按：這批抄本後來以「滿漢名臣傳」為名刊印行世）。[80] 除了這批列傳以外，錄有郭疏內容的還有蔣良騏（1723–1790）《東華錄》和昭槤（1776–1830）《嘯亭雜錄》。雖然《東華錄》所記不如這批傳記詳細，但終歸保存了郭疏的主體內容，而《嘯亭雜錄》則完整地載錄了郭疏（按：疑其記載來源為《滿漢名臣傳》）。蔣良騏的《東華錄》十六卷原本，初於日本天保四年（1833）由江戶的昌平坂學問所刊行問世，而在中國，是書至遲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就已「傳鈔既廣」。

[79]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頁538。

[80] 王彩雲，〈《滿漢名臣傳》的版本及其價值〉，頁48；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頁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嘯亭雜錄》，其在道光年間「始出未久，抄本或即稍稍流通」，[81] 後「遲至同、光，始得流行」。[82] 故而晚清人實有通過此二書了解到郭琇所描繪的高士奇形象之可能。

又考《四庫全書總目》，知四庫館臣雖未在《華野疏稿》的提要中言明郭疏的具體內容，卻這樣寫道：

> （引者按：郭琇）復劾奏王鴻緒、高士奇、徐乾學等黨援交通……蓋當其彈抨得實，則拔擢以旌其忠……[83]

這是言及此事的官方史料中最早公諸於世的一則，它使得高氏那負面的形象作為「政治正確」被傳達給了世人。對晚清人而言，《四庫全書總目》、《滿漢名臣傳》、《東華錄》和《嘯亭雜錄》是其能夠獲知郭疏內容最主要的信息來源。實際上，這也是在《清史列傳》和《清史稿》刊印之前，大部分人能夠了解到郭疏內容最主要的途徑。[84]

紅學家孫桐生（1824–1908）在作於同治十二年（1873）的〈妙復軒評《石頭記》序〉中提到：

---

[81] 對這部《東華錄》刊刻時間的辨析，參見辛德勇〈從清宮秘藏到日本官板——記和刻本蔣氏《東華錄》〉一文（辛德勇，〈從清宮秘藏到日本官板——記和刻本蔣氏《東華錄》〉，收入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編，《宮廷典籍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頁19-20）。這也是迄今為止，關於蔣良騏《東華錄》的最精詳的研究。奕賡，〈《東華錄綴言》自序〉，《東華錄綴言》，收入奕賡撰，雷大受校點，《佳夢軒叢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7。羅盛吉，〈《嘯亭雜錄》版本比較初探〉，《滿語研究》，2014年1期，頁23。

[82] 鄧之誠，〈《永憲錄》跋〉，收入蕭奭撰，朱南銑點校，《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423。

[8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55，頁501下。

[84] 《清史列傳》中高士奇傳記的稿本來源，應當出自清國史館纂修的《大臣列傳稿本》或是《滿漢名臣傳》。從文字內容看來，《清史列傳》和《滿漢名臣傳》是一致的。關於《清史列傳》稿本來源的研究，參見王鍾翰，〈清史列傳·點校序言〉，《清史列傳》，頁1。取《清史稿》所載的高士奇傳記同《清史列傳》中的高士奇傳記相比勘，可以發現二者文字大略相同，則前者之史源亦和後者一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若賈雨村，即高江村也。高以諸生，覓館入都，主於明僕，由是進身致通顯。若平安州則保定府之別名，李御史即郭華野之易姓，而特以真事既隱，正令人尋蹤按蹟而無從。[85]

從「高以諸生，覓館入都」等語及《紅樓夢》中的相關情節可知，孫氏必定清楚郭疏的具體內容。而「主於明僕，由是進身致通顯」一句，卻也證明晚清人在論及高士奇的早年經歷時，已深陷於不同版本傳聞的糾纏之中。

孫桐生對高士奇其人的認知源自何處已不可考，但李元度（1821–1887）的認知卻無疑來自於《滿漢名臣傳》。作為《滿漢名臣傳》的讀者，李氏在撰寫《國朝先正事略》時，便以此書作為其參考。《事略》中的高士奇傳記，其史源之一就是《滿漢名臣傳》，而另一史源，則是鄭方坤（1693–？）所撰的《本朝名家詩鈔小傳》（按：又名《國朝名家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所載高士奇事蹟乃私撰之高氏傳記中最足述者。此書撰於乾隆十四年（1749）之後，有足本和刪訂本兩個版本系統。足本即杞菊軒刻本，這一版本該是刊刻於乾隆十四年之後至乾隆十七年（1752）之前的三年間。乾隆五十九年（1794），此書經馬俊良刪訂並收入《龍威秘書》後，才開始在世間流傳開來。[86]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清吟堂詩鈔小傳〉云：

>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自少好學能文，家固貧，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魄羈窮，賣文自給。新歲為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寫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為聖祖皇帝所見，大加擊節，立召見，旬日之間，三試皆第一，於是簡入內廷供奉。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洊陞詹事府少詹事。……至於柏梁侍宴，天祿校書，行幄屬車，賡歌載筆，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先生素謹慎，口不言溫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致通顯，朝士多側目。會有造蜚語上聞者，賴天子仁聖，放歸田里，曲示保全之意。越五年，復以原官起用，仍內直如故。謝表所云：「愧寵榮之踰分，致嫌怨之紛來，荷蒙曲護孤根，得遂歸田之

---

[85] 孫桐生，〈妙復軒評《石頭記》·序〉，收入曹雪芹、高鶚著，張新之評，《妙復軒評石頭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頁8-9。

[86] 竇瑞敏，〈《國朝名家詩鈔小傳》足本考略〉，《古籍研究》，2017年1期，頁116-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願；終收敝履，俾抒望闕之誠。」由中之言，知非強設矣。久之，以母老陳情，卒獲初衣之請。又數年，乃卒。[87]

高士奇的詩集多為編年排序，詩中間有自注以說明其生平經歷，而鄭方坤讀過高氏的詩作，故對其生平活動十分熟悉。但《本朝名家詩鈔小傳》所述高士奇受康熙帝賞識並召見，及其供奉內廷之經過，則多與事實不合，疑此或是另有所本。又，鄭方坤謂高士奇「三試皆第一」，雖確有其事，可卻並非發生在高士奇供奉內廷之前，更不是「旬日之間」發生的。

《隨輦集》卷一有組詩〈恩擢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支正六品俸，於紫禁城內給賜房屋，供奉內廷，感戴隆恩恭紀四十韻〉，中一首「賞幟昔三番」句下自注云：

> 康熙十年四月初三日，翰林院奉勅考試留用；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院奉勅再試；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特旨于起居注考試，三次試卷進呈，蒙聖恩俱擢第一。[88]

至於高士奇升任上述職務的時間節點，分別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冬天、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和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89]《本朝名家詩鈔小傳》所謂「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洊陞詹事府少詹事」，實際上是種背離歷史事實的敘述。因知在鄭方坤所建構的敘事脈絡中，其情節要素始終是為突出高士奇的遭遇之奇、聖眷之深而服務。但鄭氏在大體上還是尊重歷史事實的，這是其書和那些以傳聞為主要素材的記載所不同之處。

更為重要的是，在《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和郭疏塑造的高士奇形象之間，呈現出來的是兩種極端。鄭方坤的意圖是塑造高士奇作為康熙帝近臣的正面形象，他所謂「會有造蜚語上聞者」云云，或是暗指攻訐高氏之郭琇者，亦未可

---

[87] 鄭方坤，《本朝名家詩鈔小傳》（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間杞菊軒刻本），卷上，葉37a-38a。

[88] 高士奇，《隨輦集》，卷1，頁461上。

[89] 高士奇，《獨旦集》，卷1，頁112上；高士奇，《經進文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3，頁276下-279下；高士奇，《隨輦集》，卷10，頁525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在他看來，康熙帝以「放歸田里」作為對高士奇的處置，是康熙帝身為仁聖之君的證明，而「先生素謹慎，口不言溫室樹」，則說明高氏是謹慎奉公之臣。細味其敘事之立場，可知其在否定了對高士奇指控之正當性的同時，也確立了高氏作為正面人物的形象。

論及高士奇退居平湖之緣由，和《本朝名家詩鈔小傳》持同樣立場的，還有乾隆十年（1745）纂修的《平湖縣志》。《志》謂高士奇是「遭謠諑歸里」，⑨⓪ 這就和鄭方坤一樣，暗示高氏結黨營私是子虛烏有之事。但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纂修的《平湖縣志》中，相關內容被以「歸里，徙居平湖」一筆帶過，⑨① 而光緒十二年（1886）纂修的《平湖縣志》則作「己巳歸里，始家平湖」，⑨② 這必然是乾隆四十年三月發佈的那道諭令所產生的影響（按：不過，光緒時的修志者更可能是沿襲舊說，而非像乾隆帝統治後期的修志者一樣受到政治權威的影響）——既然高士奇參與黨爭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那麼郭琇所奏自然所言無虛，因而「遭謠諑歸里」的說法便不能繼續出現在地方志這類地方官為了體現自身政績，召集鄉里陋儒進行纂修，由地方政府監修而成的記載之中。⑨③

經由諭令的發佈，乾隆帝之意志得以對史臣產生影響，高士奇等人在官方的歷史書寫中也終於被塑造成了無可置疑的反面人物，這正是其與鄭方坤所作描繪的差異所在。但二者的相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肯定，甚至是強化了康熙帝作為聖明之君的歷史形象，讚許了其對臣屬賞罰分明的統馭手段，即使這些意圖在這兩種類型的描繪中佔據的位置並不相同。要之，雖然二者都借助了政治權威的力量來進行對高氏歷史形象的塑造，但是它們所選擇的書寫模式卻是背道而馳的。

---

⑨⓪ 高國楹等修，沈光曾等纂，《（乾隆十年）平湖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16冊（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2），卷7，頁252下。

⑨① 張力行纂修，《（乾隆四十五年）平湖縣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卷12，葉53a。

⑨② 彭潤章等修，葉廉鍔等纂，《（光緒）平湖縣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二年刻本），卷16，葉9b。

⑨③ 有關地方志的纂修和特點，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真正在後世產生影響，並為塑造高士奇之形象推波助瀾的，還是說部文獻之中的記載。

趙翼（1727–1814）《簷曝雜記》卷二〈高士奇〉曰：

> 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襆被進彰義門。後為明相國家司閽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人。司閽以江村對，即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既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即抽某書翻閱。偶天語垂問，輒能對大意。以是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消息。…… 以是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 後以忌者眾，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携書編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㊹

趙翼從乾隆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便一直在北京生活，㊺ 這段極具傳奇色彩的記載，就是根據他這時的見聞寫成。㊻ 準確地說，並非高士奇同時代人的趙翼之記載，其素材來源只能是當時流傳於北京的傳聞。不過，趙翼對高氏以權謀私的刻畫，雖然將高氏塑造成了如郭疏所言的那般人物，但卻並不意味著他對高氏其人其行已作出了立場鮮明的評價——儘管趙氏在《簷曝雜記》中描繪高氏「則結近侍探上起居」云云，和鄭方坤在《本朝名家詩鈔小傳》裏對高氏「先生素謹慎，口不言溫室樹」的評價大相徑庭。

在這段文字之後，趙翼還有一段按語，然歷代論者在言及高士奇事蹟，臧否其人時，皆甚少措意：

> 按《宋史》，盧多遜為相時，太祖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先白己，輒通夕閱之。遇上問書中事，應答無滯。《魏書》溫子昇先為廣陽王淵家馬坊

㊹ 趙翼，《簷曝雜記》，收入趙翼、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簷曝雜記 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頁42。

㊺ 有關趙翼這一人生階段的活動之研究，參見陳清雲，《趙翼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52-159。

㊻ 李解民，〈《簷曝雜記》點校說明〉，收入趙翼、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簷曝雜記 竹葉亭雜記》，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教奴子書。嘗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因訪焉，由是名譽稍起。按此二事，高江村絕相似。[97]

這顯然是趙翼對這些傳聞中部分情節要素的懷疑之表露。

在趙翼之後，昭槤於《嘯亭雜錄》中塑造的高士奇形象顯然要更加富有傳奇性：

高江村士奇，華亭人。家甚貧窶，鬻字為活，納蘭太傅明珠愛其才，薦入內庭。[98]

又：

仁皇天資純厚，遇事優容，每以寬大為政，不事谿刻。……又枉法諸臣，苟可宥者必寬縱之。……徐健菴乾學昆仲與高江村比昵，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澹人」之謠，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嘗論近臣曰：「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貲？可細究乎！」其明通下情若此。[99]

在這兩條記載中，第一條是昭槤將高氏入內廷供奉之功歸於明珠（1635–1708），且昭槤將高氏誤作華亭人，可知他並不熟悉高氏的家世和生平；第二條則是描述了高氏結黨營私之情狀，只不過昭槤的意圖是塑造康熙帝「明通下情」的仁君形象，其所舉徐、高諸人結黨營私之事只是為了起到渲染康熙帝形象的作用。但是他生動地描繪了康熙帝對諸大臣的寬待，也就無意間站在了和趙翼相同的立場上。換言之，《嘯亭雜錄》與《簷曝雜記》對高士奇受賄的記載，應該有著同樣的來源，這也就從側面說明，當時民間對高士奇其人其行的看法歷經百餘年，已在特定的一端沉澱了下來。如光緒年間刊行之陳康祺

[97] 趙翼，《簷曝雜記》，卷2，頁42-43。
[98] 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8，頁254。
[99] 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卷1，頁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40–1890）《郎潛紀聞二筆》，便承襲此種說法。[100]

《簷曝雜記》見於乾、嘉間所刻之湛貽堂本《甌北全集》中，若計入此本之後印和光緒三年（1877）滇南唐氏所刻之《甌北全集》，則知是書在嘉慶、道光和光緒年間刷印多次，流傳較廣。《簷曝雜記》與《嘯亭雜錄》皆流行於文網漸馳之後，與乾隆年間刊印、流通之《本朝名家詩鈔小傳》相較，乃是順應其時說部文獻撰述風氣之轉變者，[101] 故《本朝名家詩鈔小傳》之影響遠弗如《簷曝雜記》及《嘯亭雜錄》，正理所當然。而由此亦可知當時之情勢也。

可以佐證這一觀點的，還有阮葵生（1727–1789）《茶餘客話》和戴璐（1739–1806）《藤陰雜記》中關於高士奇的兩條記載。

《茶餘客話》卷九〈高士奇〉云：

> 康熙辛亥，高江村（士奇）御試第一，入直禁中。乙卯冬，設詹事府，補錄事。一日賦〈紀恩〉詩，有「空對西風嘆二毛」之句，江村是年三十二歲也。上覽之，似有憫憐之意，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庚申夏，擢翰林院侍講。葉訒菴方藹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顏一笑時。內府錦襦邀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鉤體，宮女爭吟〈壁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102]

高士奇《獨旦集》卷一有組詩〈悼亡并序〉，中一首「較讀回回夜炬然」句下自注云：「辛亥四月初三日，余蒙御試第一。」[103] 可知其確實是御試第一。然以《茶餘客話》所記與高氏生平經歷相較，卻仍有不合之處。

---

[100] 參見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收入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 二筆 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1，頁533-534。

[101] 孟森在民國五年（1916）概括這種風氣轉變的原因時說：「有清易代之後，史無成書，談故事者樂數清代事實。又以清世禁網太密，乾隆間更假四庫館為名術，取威脅禁毀改竄甚於焚書坑儒之禍，馳禁以後，其反動之力遂成無數不經污衊之談。」（孟森：〈心史叢刊·序〉，《心史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

[102] 阮葵生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茶餘客話》（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卷9，頁226。

[103] 高士奇，《獨旦集》，卷1，頁111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按：這條記載本自《歸田集》卷十二所收〈補董文敏書《秋興賦》〉一題，其第三首「不數安仁興獨豪」句下自注云：

> 余年三十二，以詹事府錄事入直禁中。一日，賦〈紀恩〉詩，有「空對西風歎二毛」之句，上賜覽之餘，天顏似有憫色。未幾，遷官中書舍人。明年秋，復蒙賜御書《秋興賦》。⑩④

高士奇自注謂事在其三十三歲時，然高氏獲賜康熙帝所書《秋興賦》為康熙十七年（1678）四月十八日事，⑩⑤ 彼時高氏已三十四歲。蓋知高士奇此條詩注於時間一端係為誤記，而阮葵生之誤顯是誤讀高士奇詩注所致。儘管如此，但阮氏的記載在部分內容上直接取材於高士奇詩集這一點，該是毫無疑問的。

《藤陰雜記》卷一：

> 高江村士奇，錢塘諸生，年十九，貧，至京師，賣文自給。新正為人書春帖子，自作聯句，偶為聖祖御覽，召見，授錄事。年三十二，有「空對西風嘆二毛」之句，遂改中書，擢侍講。不數年，晉宮詹，放歸。起用，歿，謚號文恪。⑩⑥

細繹此條記載，不難發現其是在糅合了《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和《茶餘客話》的相關內容之後寫成的。

晚清人王錫祺（1855–1913）曾談及《茶餘客話》的版本：

> 去秋，司寇裔孫鐵庵先生慨然見假，始知原卷二十二。湖州戴蒓塘選十二卷為單行本，松江吳泉之刻入《藝海珠塵》，顛倒先後，尤改舊觀。⑩⑦

在戴璐選編的十二卷本《茶餘客話》中，載有高士奇軼事的內容被移置到了卷一，其中「康熙辛亥」還誤為「康熙辛酉」，同時高士奇的年齡也被寫

⑩④ 高士奇，《歸田集》，卷12，頁240下。
⑩⑤ 吳嘉龍，〈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頁265。
⑩⑥ 戴璐撰，施紹文點校，《藤陰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1，頁13。
⑩⑦ 王錫祺，〈《茶餘客話》跋〉，收入阮葵生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茶餘客話》，頁7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了三十三歲，[108] 故知王氏所言不虛。雖然近來歐陽健認為十二卷本《茶餘客話》的改動「主要是作者阮葵生本人所為」，[109] 但無論是書二十二卷本和十二卷本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茶餘客話》和《藤陰雜記》中關於高士奇記載之內容的演變過程已明白無疑。

《茶餘客話》約寫成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之前，是書在阮葵生生前並未刊行，後此二十餘年，才得選為十二卷本行世，光緒年間付印之二十二卷本則流傳不廣。[110] 而《藤陰雜記》初刻版行不廣，光緒三年才由戴璐同鄉沈鉉取原版重印，其流布自此始。[111] 是以，知此種取材於高氏詩集的記載或流佈於文網漸馳之前，或湮沒於撰述風氣轉變之後，故遂使離奇不經之傳聞成為社會主流。

然就這些記載中的「虛」與「實」而言，說部文獻之所以能夠在與傳記書寫的競爭中取得勝利，實為官方定性和民間想像合流，再加上世風轉變等因素綜合作用而成的結果。在這種浪潮中，雖然《茶餘客話》和《藤陰雜記》所述高士奇故事的主體內容真實可信，但同時也為那些描繪高氏其人遭際之奇的情節作了注腳。再次，既然其「虛」的部分乃是源於傳聞，而作為虛像的傳聞又是非官方的，那麼它的背後往往就會隱藏著庶民階層樸素的想法。故而這些傳聞雖是虛構的，卻也是真實的，只不過它們屬於社會的真實而非歷史的真實。[112]

---

[108] 阮葵生，《茶餘客話》，收入吳省蘭輯，《藝海珠塵》（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間刻本），卷1，葉5a。

[109] 歐陽健，〈《茶餘客話》版本論考〉，《全清小說論叢》，第1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頁248。

[110]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茶餘客話》出版說明〉，收入阮葵生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茶餘客話》，頁3-4。

[111] 施紹文，〈《藤陰雜記》點校說明〉，收入戴璐撰，施紹文點校，《藤陰雜記》，頁2。

[112] 值得一提的是，立足於高士奇生平事蹟，點明說部文獻所載高氏軼事有荒誕不經者，首推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賴襄（1780–1832）。賴襄〈《高江邨集鈔》序〉曰：「夫士奇早達，不由人薦引，出入密勿，前後十五六年。既罷復起，雖謗讒交攻，終得別白。說部或有載謗為實者，而《康熙實錄》可考焉。」（賴襄著，近藤元粹評點，《評點山陽遺稿・文》〔日本明治十二年刻本〕，卷10，葉6b-7a。）賴氏熟習高士奇生平，其論述當為研究高氏相關史事者所重，然直至今日，其言卻仍罕為人知，惜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高士奇歷史形象的最終成立

實際上，在康、雍、乾三朝，庶民階層對高士奇其人的印象雖未必正面，但也絕對不能以奸邪目之。然自晚清以降，高士奇的形象卻開始在民間惡化起來。譬如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二筆》中對高氏的描繪，就反映出了彼時民間視高氏為奸邪之人的輿論已被推向高潮：

> 康熙己未試鴻博科時，有進「三不如」之說於上前，以毀百四十三徵士者。（按：《施愚山年譜》作一百七十五人，《竹垞年譜》作一百九十餘人，王氏《池北偶談》、方渭仁《松窗筆乘》及《鶴徵錄》引李武曾所記，均作一百八十六人。此則引張石洲《閻百詩年譜》，仍其原文。）上意寖衰，一時譁然，以為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見閻百詩〈與陸翼王書〉。（或曰：進三不如說者，高江村也。）⑬

清末民初人孫靜庵更是以《簷曝雜記》和《郎潛紀聞二筆》為基礎對這些軼事進行了改寫，並且還將「三不如」之說的提出者直接定為了高士奇。⑭ 儘管如此，關於高士奇形象惡化的原因，仍可作進一步的考察。

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案是雍正朝的文字獄大案，關於雍正帝對此案的處置和定性，《東華錄》所記甚詳：

> 刑部等奏：「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斬決。」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定擬立決具奏，姑從其請，著立斬梟示，妻孥分別發遣。」⑮

---

⑬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14，頁595。

⑭ 孫靜庵編，《棲霞閣野乘》（上海：中華圖書館，1913），頁18-20。

⑮ 蔣良騏，《東華錄》（日本天保四年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刻本），卷13，葉19a。按：關於這部《東華錄》的史料價值，辛德勇已舉例論述。參見辛德勇，〈從清宮秘藏到日本官板——記和刻本蔣氏《東華錄》〉，頁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雍正朝文字獄的查辦重點之一，是禁毀年羹堯和隆科多（？–1728）門下之士的著作，《讀書堂西征隨筆》亦在其列，[116] 而汪氏本人的結局也足夠讓人警醒。[117] 是以，清代文字獄帶來的政治壓力更是會讓時人對這些內容格外敏感。

不過，雖然官方對此的控制力度在長時間內都極為強勁，但是曾參與過實錄纂修的蔣良騏和吳振棫（1792–1870）都讀到過郭疏的內容，並將其寫進了自己的著作之中，二者對高士奇其人的看法自然也因此受到影響。然而，《東華錄》是蔣氏為了備其本人查考相關史事而編錄者，「再加之書中有一些內容，與官修實錄亦相抵牾，事實上也不便遽然公諸於世」；而吳氏的《養吉齋餘錄》在其生前未及梓行，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才由其曾孫、藏書家吳士鑒（1868–1934）在南昌刊刻問世；是故，二書皆非成書後便得付印流傳。[118]

雖然官方對高士奇結黨營私一事的定性，最早是經由《四庫全書總目》之記載才開始在民間流傳的，但這卻並不意味著《總目》所記就是導致高氏之形象發生惡化的主要原因，因為《總目》的受眾僅限於士人階層（Literati），通過《華野疏稿》之提要注意到相關內容的人則更少。要之，傳聞的持續影響和人們的思維慣性，才是高氏之形象在庶民階層之中發生急劇變化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晚清以降，在趙翼和昭槤等人的記載開始得到傳播並產生影響之後，高氏那不太光彩的形象，便進一步和人們的固有印象相結合，繼而留存在了人們心中。

可縱使高士奇人品之卑劣早已成為清初以降的社會共識，但卻仍有因孤陋寡聞而隔絕在此種共識以外的個體，尹嘉銓（1711–1782）就是其中之一。

在乾隆帝統治的中後期，尹嘉銓案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字獄案。在官方檔案中，此案被稱作〈尹嘉銓為父請謚並從祀文廟案〉，檔案中有這樣一份供詞：

---

[116] 有關論述參見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3），頁62-66。

[117] 不過將汪景祺的獲罪全部歸因於文網恐怕也是有失偏頗的。黃裳在記汪氏的《讀書堂詩集》稿本時說：「……其得罪由於年黨，非只筆墨細故而已。」（黃裳，《前塵夢影新錄》〔濟南：齊魯書社，1989〕，頁47。）當是更符合歷史事實的判斷。

[118] 參見蔣良騏，《東華錄》，卷9，葉8a-10b；吳振棫，《養吉齋餘錄》，收入吳振棫撰，童正倫點校，《養吉齋叢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4，頁386。辛德勇，〈從清宮秘藏到日本官板——記和刻本蔣氏《東華錄》〉，頁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問：高士奇的行私納賄，人人多知道的，即高其位由提督擢為大學士並無政績可稱，其餘蔣廷錫、張廷玉、鄂爾泰、史貽直等亦豈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錄》內如何一併列入，是何意思？
供：……但其中文字亦並非我杜撰，或將志書、行述或墓碑上採取來的，今大人們指出高士奇行私納賄……我也自悔無知妄作，任臆記載……⑲

尹嘉銓案發生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撰作《名臣言行錄》歌頌盛世是尹氏的罪狀之一，尹氏還因書中收錄了高士奇等人的事蹟而受到質問，可見高氏形象之卑劣，經過傳聞的渲染和官方書寫的定性，已經在官員們這裏成為了被壟斷的歷史認識。

這種種情況都在表明，因為官方對高士奇其人的態度從乾隆帝統治的中後期開始發生轉變，所以同時也導致了可供相關傳聞肆意發揮之空間的進一步擴大。而隨著時間流逝，它們最終也和官方塑造的高士奇形象合流，繼而完成了對作為典型道德批判之標靶的高士奇形象的塑造，並為後人對高士奇形象的認識之形成提供了思想資源。

六、羅振玉的「幽靈」

民國十三年（1924），羅振玉將其收藏的清抄本《江村書畫目》付梓刊行，⑳ 是為《東方學會叢書》初集本《江村書畫目》。㉑ 此本書後有羅氏跋文，跋云：

《江村書畫目》一卷，繕寫甚精。後有吳穀人祭酒跋，謂出文恪手書。然卷中有注文恪公跋者，則此卷殆書於文恪後人，非出文恪手也。目分九

⑲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頁359。

⑳ 對《江村書畫目》遞藏源流的敘述，參見錢存訓，〈精寫本《江村書畫目》題記〉，《文獻》，2002年3期，頁144-146。

㉑ 錢存訓在述及《江村書畫目》的版本時，將上海來青閣書莊印行的石印本《江村書畫目》之底本，記作時為羅振玉所藏的清抄本（錢存訓，〈精寫本《江村書畫目》題記〉，頁146）。可實際上，這一印本是從《東方學會叢書》初集本翻印而來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類：曰進，曰送，曰無跋藏玩，曰無跋收藏，曰永藏秘玩，曰自題上等，曰自題中等，曰自怡……其曰「進」者以進呈……案：文恪以韋衣入侍近禁，位至列卿，遭遇之奇，今古所罕，而通賄營私，屢登白簡，幸賴聖祖如天之仁，始終保全，宜如何冰淵自惕，乃竟以贋品欺罔，心術至此，令人駭絕。其留此記錄以遺後人，殆不啻自暴其惡。爰付印以傳之，俾世之讀是編者，知當時言官所彈，猶未能燭其隱微，不如其自定之爰書為詳盡也。甲子三月，上虞羅振玉書。
>
> 文恪以鑒賞負時譽，然學識實疏。……其涼德如彼，而鑒別又若此，世人顧猶以書畫之曾經江村品題者為可增價，故記之以解其惑。松翁又記。㉒

羅振玉所言「知當時言官所彈」云云，乃指郭疏而言。既然晚清人得知郭疏內容主要基於《四庫全書總目》、《滿漢名臣傳》、《東華錄》和《嘯亭雜錄》等書，羅氏自不應例外。因為一來《清史列傳》在民國十七年（1928）才由上海中華書局以線裝鉛印之形式刊佈於世（按：《清史稿》亦於是年刊印）；二來檢羅振玉《大雲精舍藏書目錄》及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羅氏藏書目錄》，均未見著錄《郭華野先生疏稿》，故羅氏得見此書的概率不大。故而雖不能認定羅振玉確未親見《郭華野先生疏稿》，但卻可以說，其人獲知郭疏相關內容，必不以此書為最主要的信息來源。

考諸歷代論述，知高士奇進贋之說，乃始自羅振玉，即其跋中「其曰『進』者以進呈」、「乃竟以贋品欺罔」之語也。然細審其言，知其論述重點是高氏其人「心術至此，令人駭絕」，進贋與否不過是用以佐證「當時言官所彈」並非冤枉、栽贓而已。這實是羅氏自己通過建立在對高氏遭遇奇絕、深受聖寵的歷史認識上所作出的判斷。但其間的邏輯關係只是因與果的簡單對應，它實質上是由長期以來層累形成的歷史認識對羅振玉產生的影響所誘導出來的可能性。換言之，在面對由《江村書畫目》之記載所帶來的巨大震撼時，羅振玉選擇了以他所認識的高士奇之形象作為基準，來對這種矛盾進行調適，並借之求得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

㉒ 羅振玉，〈《江村書畫目》跋〉，葉1a-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振玉「實一熱衷世事者」，[123] 檢《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見其孫羅繼祖於民國三年（1914）三月三十日，羅振玉致王國維（1877–1927）一札後所加按語云：

> 據此札，公雖身在國外而心仍繫國內治亂，且念念不忘清朝復辟。[124]

羅氏歸國之後，仍為復辟事奔走不歇，此已眾所周知。而羅氏政治立場之堅定，亦對其學術活動影響極深。

謝正光嘗考論羅振玉撰作《萬年少先生年譜》之政治意圖，曰：

> 羅氏譜徐枋之生平，意在樹立忠君之典範，與後來所撰之《羅譜》（引者按：即《萬年少先生年譜》）同。[125]

又：

> 羅氏時年五十七歲，終宿願得償，自與其回國前所輯刊之《徐俟齋先生年譜》、《萬年少先生年譜》兩書，以及定居天津後賑濟京師旗人之種種活動，有密切關係。蓋著書立說，與領導社會活動，自古即士人自我宣傳之慣用伎倆。就羅氏而言，此二者亦其本人對遜清忠誠之至佳自我表述也。[126]

復考羅振玉《集蓼編》：

> 予往在海東，築小樓敬儲列聖宸翰，番禺梁文忠公為署樓榜曰「宸翰」。及寓遼東，復以是榜揭寓樓。[127]

---

[123] 謝正光，〈羅振玉《萬年少先生年譜》考論〉，《清初之遺民與貳臣》，頁126。

[124] 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14。

[125] 謝正光，〈羅振玉《萬年少先生年譜》考論〉，頁122。

[126] 謝正光，〈羅振玉《萬年少先生年譜》考論〉，頁127-128。

[127] 羅振玉，《集蓼編》，《集蓼編（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羅氏尤為重視康熙帝所書「雲窗」二字橫匾，此事參見他在〈《雲窗漫錄〉序〉中的自述：

> 宣統辛亥冬，予既避世海東，得聖祖仁皇帝御書「雲窗」二字橫額，張之寓樓，晨夕瞻對，坐起其下者七八年。[128]

其人對清代諸帝墨蹟之寶愛，對康熙帝書法之視若神明，於此可見一斑。

康熙帝既在羅振玉心中有極高地位，則羅氏眼中深得康熙帝恩寵卻以贋進上之高士奇自然罪無可恕，羅氏撰作此跋之用意何在，更是毋庸贅言。而其所得匾額，或即康熙三十六年八月，康熙帝賜予高士奇者。[129] 羅氏若知有此種因緣，不知會作何感想？

除此以外，羅振玉此說對後世書畫鑒藏史影響之深遠，更是其所難以預料。

余紹宋（1882–1949）《書畫書錄解題》提到《江村書畫目》時就說，「後有羅振玉跋，評論至當，不必更作解題」，[130] 俞劍華（1895–1979）《中國繪畫史》亦從羅氏之說，認為《江村書畫目》乃是高士奇手訂，高氏「以贋而廉者為進呈贈送之用，以真而昂者為永存秘玩之用」，[131] 所以「其人心術本不正，故有此欺罔之行為也」。[132] 這兩部著作在學術史上的影響力自不待言，而其後奉羅氏此說為圭臬者愈多，如葉恭綽（1881–1968）《遐庵談藝錄》即是。[133] 葉氏之書印數不多，流傳不廣，姑且不論，但張珩（1915–1963）、徐邦達（1911–2012）和楊仁愷（1915–2008）等書畫鑒定家的說法卻在有關的研究領域內影響甚大。

---

[128] 羅振玉，《貞松老人外集（附補遺）》，《松翁近稿（外十種）》，頁800-801。

[129] 吳嘉龍，〈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頁311。

[130] 余紹宋撰，戴家妙、石連坤點校，《書畫書錄解題》（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479。

[131] 俞劍華，《中國繪畫史》，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306-307。

[132] 俞劍華，《中國繪畫史》，下冊，頁307。按：俞劍華對羅振玉觀點的了解，乃是據《書畫書錄解題》所錄羅跋而來。參見俞劍華，〈《中國繪畫史》凡例〉，《中國繪畫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4。

[133] 葉恭綽，《遐庵談藝錄》，收入葉恭綽撰，李軍點校，《遐庵清秘錄 遐庵談藝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3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珩在《怎樣鑒定書畫》中說：

> 高士奇在清代鑒藏家中也是數得上的，但羅振玉得到了他的秘本《江邨書畫目》，發現把許多進呈給皇帝的假字畫記在上面。⑬④

如果說張珩只是如實轉述羅跋所言，那麼自徐邦達開始，有關的敘事就已經開始摻雜價值判斷了。

徐邦達《古書畫鑑定概論》云：

> 高士奇在他的《書畫目》中，也透露了他以僞書畫來「進」「送」等有意欺人的行徑。⑬⑤

而楊仁愷則是在羅跋的基礎上作了較多的發揮：

> 《江村消夏錄》之撰寫，其所以科學性不夠理想，在于作者有意混淆真贋以欺世，此是根據後來發現《江村書畫目》而得以證實的。⑬⑥

這一說法亦見於楊氏主編的教材《中國書畫》，且書中還衍生出了郭琇彈劾高士奇乃是因後者以贋進上這樣的錯誤：

> 《江村消夏錄》三卷……在體例上比較精密，為後世諸著錄書所仿效。但對作品真僞多未評定，許多作者明知的贋本也充塞其間，看來是有意混淆視聽。……《江村消夏錄》中未加任何說明的作品，「書畫目」中均有鑒定評語……因此，他進呈皇帝的書畫幾乎全是假的，曾遭到當時言官彈劾。⑬⑦

---

⑬④ 張珩，《怎樣鑒定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66），頁20。

⑬⑤ 徐邦達，《古書畫鑑定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59。

⑬⑥ 楊仁愷編著，《國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頁41。

⑬⑦ 楊仁愷主編，《中國書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614-615。按：楊仁愷在後來完成的《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中仍持此說。參見楊仁愷，《中國書畫鑒定學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頁3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心而論，如果說隨著時間流逝，羅跋的性質經歷了從羅振玉眼中意在臧否人物之文字，再到逐漸被後人視為獨立之學術文本的變化過程。那麼在這種變化最終使得羅氏「遺老」的一面被深藏於學術的帷幕之後時，其真實意圖也就令人難以覺察了。後來那些信從其說的書畫鑒定家經過不懈努力，最終讓羅氏的論說變得疑竇叢生，反而構成了奇妙的因果關係。就此而言，這些書畫鑒定家又是用心而有功的。

關於高士奇是否以贋進上這個問題，張珩、徐邦達、楊仁愷等人顯然深受羅振玉的影響。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觀之，他們的錯誤是由於因襲成說而未及深考所致，但這也確實影響了後人對高士奇其人其書的認識與評價，更使得後來的許多研究者沒能跳出羅振玉的束縛。歸根結底，這是本就普遍存在的輿論滲透到書畫鑒藏研究中的結果，而這種輿論又以羅振玉的學術影響力為媒介，通過對高士奇在書畫鑒藏史上的形象進行描繪，塑造了人們，至少是大部分人的歷史認識，並一步步地將高士奇的歷史形象塑造為如今人們所熟悉的模樣。

結語

在高士奇身後數百年來的討論中，如果說高氏在書畫鑒定這一領域的成就還有人挑戰和質疑的話，[138] 那麼對其人品的看法，卻可以說是眾口一詞，毫無疑義的。然而對後者的議論卻並未使高氏作為清初書畫鑒藏史上一大權威的聲望有所減損，更未因此影響到高氏書畫鑒定意見的權威性和可靠性。[139] 那些高氏的挑戰者和質疑者，在有清一代也是就事論事，並不存在以人品來衡量其書畫鑒藏之實踐的情形。同樣是「經典化」，在高士奇的歷史形象愈發豐滿，

[138] 有關論述參見吳嘉龍，〈出版、閱讀與知識傳播——以《江村銷夏錄》為個案的研究〉，頁84-89。

[139] 晚清時李佐賢（1807–1876）對高士奇書畫鑒定意見的推崇，就是個能夠證明這一情形的典型案例。李氏在其纂輯的《書畫鑑影》卷三「夏禹玉長江萬里圖卷」條中寫道：「此編皆載余所寓目者，獨此卷聞而未見，今尚在山左，友人多有見者，皆贊美無異詞。且曾經高江村鑒定，知為真蹟無疑，故破格載之。」（李佐賢纂輯，《書畫鑑影》，《續修四庫全書》，第108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3，頁665上-665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愈發離奇之時，其在書畫鑒藏史上的聲望反而隨著《江村銷夏錄》的流佈逐漸提高。而導致此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更多地還是在大量私家書畫收藏歸於內府之後，易於得見之《江村銷夏錄》被視為可靠的知識文本流傳於世之故。因為彼時高氏其人和《江村銷夏錄》之間的關係，已經完成了從「由人及書」到「由書及人」的轉變，⑭⓪ 故而這種知識的可靠性使得高士奇在書畫鑒藏史上的形象完全不受其飽受爭議的人品之影響。羅振玉的觀點之所以有如此影響，是因為通過羅氏的評定，使這種關係完成了從「由書及人」向「由人及書」的復歸。當構成信任基礎的東西被粉碎殆盡，隨之而來的自然就是無窮無盡的懷疑——就像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所說的：「正如謊言一旦被拆穿，我們就不會再相信謊言。」⑭① 可這種信任基礎會輕易破碎，亦是歷史環境使然——若非清宮秘藏頻頻湧現於世，後人又怎會輕易相信羅氏所言？

那些相信高士奇以贋進上的書畫鑒定家多有寓目清宮秘藏的經歷，這種經歷促使他們無法不認為羅振玉所言屬實。在實物和文獻的反復「印證」中，高士奇的形象必然會被摧毀，而後再行重塑。如故宮博物院的「元老」人物那志良（1908–1998）就寫道：

> 清朝有個收藏家高士奇，康熙在南巡時，賞識他的才幹，把他帶回朝中，漸漸地位至列卿。他為了報答知遇之恩，常常拿了名畫充貢。可是你若是看到他自己寫的《江村書畫目》，你就知道了，他把自己的畫，分為九類：其中有所謂「永存珍秘」的，是真品而值昂的，自己保存，絕不示人；有所謂「進」的，是用以進呈的；有所謂「送」的，是用來作饋送之用，都注明是「贋蹟且值極廉」的。高士奇深得康熙知遇，還以贋蹟進呈，宮中怎能沒有偽畫呢？⑭②

總而言之，以清人和羅振玉及羅氏觀點之信從者的態度合觀，其所反映的乃是時代變化導致的差異——「蓋時代不同，觀點亦異，此一代有一代之史

⑭⓪ 有關論述參見吳嘉龍，〈論《江村銷夏錄》之流傳與閱讀〉，頁89-90。
⑭① 列夫·托爾斯泰著，婁自良譯，《戰爭與和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頁283。
⑭②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而歷史人物之評價，古今往往異趣之基本規律也。」⑭ 然此種史觀與評價之轉變，既是向那個作為傳統書畫鑒藏史敘事體系中之權威的高士奇告別而奏響的挽歌，同時自有更為深刻的學術史意義——在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政權覆亡之後，清代官方對高士奇歷史形象的定性，卻進入到了新時代的書畫鑒藏史之敘事中，並和此後的學術史緊緊地纏繞在了一起。

⑭ 謝正光，〈就《秋柳》詩之唱和考論顧炎武與王士禛之交誼〉，《清初之遺民與貳臣》，頁178-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作為藏書家和畫家的高士奇

高士奇歷史形象的最終成立實際上是一柄雙刃劍。從結果上看來，它確乎實現了對相關傳聞的統制，塑造出了恆定的高氏之形象。但它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則是使高士奇這個歷史人物所具有的多面性幾湮滅於歷史塵埃之中。

今人尚知高氏能詩善書，精於校讎，卻多不明其為一藏書家，兼之能畫。高氏收藏善本古籍事，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一「《（咸淳）臨安志》九十三卷札記稿三卷（小山堂鈔本。振綺堂舊藏）」條：

> 右為小山堂鈔本，後有乾隆甲子東潛趙一清手記，云：「聞之繡谷居士云，昔年朱太史竹垞有宋刻半部，高詹事江邨亦有半部，意欲合之，竹垞靳而不予。……雍正庚辛間修《浙江通志》，開局於南榷關署，居士與予及竹垞之孫稼翁咸與纂修。稼翁貧甚，居士為余作緣，以白金一斤購之，曾未及三分之一也。而江村白雲樓所藏，莫可致詰。」⑭

白雲樓者，高氏之藏書樓也。高士奇之為藏書家，顯而易見。

又憶昔時檢讀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見王欣夫所作補正中錄有一則書跋：

> 何小山〈法書考跋〉云：「張伯起手鈔本。向藏倦圃先生。先生歿後，將舊鈔本宋元版書五百冊質於高江村，竹垞先生倍其值而有之，此冊亦在數中。」⑮

此跋為藏書家、校勘家何煌（號小山，1668–1745）所撰。

而黃宗羲（1610–1695）在致徐乾學尺牘中則云：

---

⑭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第9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11，頁287下-288上。

⑮ 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4，頁3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曹秋老健甚，相別一月，即爾奄忽，人生不可把玩如此！傳聞其藏書盡歸先生，若然，亦是可喜一事。⑭⑥

無論真相如何，何氏所述高、朱二人圍繞曹溶（號秋岳，晚號倦圃老人，1613–1685）遺藏展開的爭奪，既證明了曹氏藏書的引人注目，同時也說明了身預傳聞的高士奇為一藏書家，乃是無可置疑之事。

復考方薰《山靜居畫論》卷下所載：

> 張浦山徵君畫師徐白洋，能出於藍。工古文，著《國朝畫徵錄》，評論繪事，曲盡其筆。友人朱君仲嘉謂其不及備載，欲補錄之，惜不永年，而其事未果。嘗聞仲嘉曰：「士之懷才不彰者多，豈獨書畫？即以畫士論，山陰馮仙湜續《圖繪寶鑒》，評論多不識畫理。然國初諸老出處約略可稽，未可沒其功也。彌伽居士《畫徵錄》論畫頗不爽，惜其所載未及詳備。耳目所及，爵里可知，如嘉興之何薳，石門之許自宏、徐王熊、鍾仁、蔣逕、葉子健，海鹽之徐令，平湖之高詹事士奇、沈岸登、沈玉山，海寧之陳與，錢塘之汪燾、康燾，松江之張司寇照，虞山之徐蛀，宜興之周復，丹山之吳培，休寧之徐棟，畫皆傳賞藝林，尚遺其名。況地隔千里，僻處蓬牖之士，可勝計哉？」⑭⑦

高士奇所繪畫作，今可見者不少，故知朱氏所言洵非虛語。且高氏曾貽友人張純修（1647–1706）以自作山水一幅，⑭⑧ 蓋時人必有知其能畫者，惟畫名或不著爾。

至於高士奇作畫之始，當可追溯至其青年時期。⑭⑨ 而高氏贈張純修之山水乃其三十五歲時作，則李濬之（1868–1953）謂高士奇「晚歲間作山水」，⑮⓪ 顯然是錯誤的。

---

⑭⑥ 黃宗羲，〈與徐乾學書〉，收入黃宗羲著，吳光整理釋文，《黃宗羲南雷雜著真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頁280。

⑭⑦ 方薰，《山靜居畫論》，《續修四庫全書》，第10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下，頁840下-841上。

⑭⑧ 吳嘉龍，〈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頁267。

⑭⑨ 吳嘉龍，〈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頁294。

⑮⓪ 李濬之編，毛小慶點校，《清畫家詩史》（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頁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人之所以多不知高士奇蓄古書、能作畫，當是因高氏其人之個別面向被不斷放大，使其餘下事蹟湮沒不彰所致。夫歷史人物之面向，雖多有為後人發掘、追認而顯於世者，然而若只推崇其個別面向，則人物之複雜性便會遭受擠壓，終至「臉譜化」。「圓形人物」之豐滿、生動，亦將落得「扁平人物」之乾癟、刻板。⑸

⑸ 對「圓形人物」和「扁平人物」這組對照概念的分析，參見E. M. 福斯特著，馮濤譯，《小說面面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頁72-84。又，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現實中的人過於模糊，不能作為虛構作品中的人物。我們所見的真實的人都是扁平的，而虛構作品中的人必須是圓形的……」（毛姆，〈《木麻黃樹》跋〉，收入毛姆著，黃福海譯，《木麻黃樹》〔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頁211-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　並不無辜的高士奇

羅振玉之說的影響並非僅局限於書畫鑒藏界，在藏書界之中，亦有其信從者。

黃裳在〈殘本·復本〉一文裏寫道：

> 周密的《絕妙好詞》，是宋人著名的詩餘選本，現在已經算不得什麼「秘籍」了。但在清初，卻是湮沒了好幾百年、許多人想看也看不到的東西。第一個把它介紹給讀書界的是和朱彝尊一起編選《詞綜》的嘉善人柯崇樸。……這是此書清代的第一刻，時在康熙乙丑。
> 得到這原刻之後，我又買到另一個吳枚庵的批本，底本也就是柯本，不過印本較後了，面貌也有所改動。……經過這樣的改變，過了十三年……板片還是舊板片，主人卻換了。[152]

「面貌也有所改動」，是說高士奇得到《絕妙好詞》的書版後，刪削改換柯崇樸、柯煜（1666–1736）校訂並刊印此書的痕跡，並作序講自己也參與了此書校刻的事。因此黃裳才在後文中指斥高氏：

> 買到前人雕槧的板片，改頭換面，就算是自己的業績了。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剽竊行為，不過在「清吟堂主人」高士奇說來，卻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他是連皇帝都敢騙的。傳說他收藏的法書名畫，記入《江村消夏錄》的，多數有真偽二本，許多假貨後來都入了「內府」。在高士奇看來，掠奪一下柯氏的勞績，又算得了什麼呢？[153]

黃裳的「傳說」，顯然是羅振玉之言的變種，其來源雖不可考，但卻揭示出了這種觀點得以被接受的另一個預設——既然高士奇行徑卑劣，那麼他再行類似的事，也是毫不稀奇的。因此，從這種角度看，高士奇的無辜，又源自他的並不無辜。

---

[152] 黃裳，〈殘本·復本〉，《榆下說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頁106。

[153] 黃裳，〈殘本·復本〉，《榆下說書》，頁106-107。按：黃裳的這種評價，後來又被林夕（楊成凱）接受。參見林夕，〈關於《絕妙好詞》〉，《讀書》，1991年11期，頁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三　賴襄〈《高江邨集鈔》序〉

按：杭州的浙江古籍出版社在2023年刊行了目前收錄高士奇著述最為全面的《高士奇全集》，然而拋開《全集》中的各種問題不論，其「附錄」部分所收的賴襄（號山陽外史，1780–1832）〈《高江邨集鈔》序〉卻極為重要。這篇序文不僅關係到《江村銷夏錄》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流傳，還體現了賴襄的清代詩學觀。不僅如此，賴氏文中關於高士奇其人的論述，更是進行學術史回顧時應該加以重視的文獻。可惜的是，《全集》所收的賴襄序卻存在一些低級的識讀錯誤，如將「康熙」誤作「亨熙」、「《康熙實錄》」誤作「《亨熙實錄》」。兼之其所據底本《高江邨集鈔》卷首序文並非賴襄此文的定本，如「長於彼則短於此，自古之為然」，定本作「彼長則此短，自古為然」；「莽蒼雄崛」，定本作「莽蒼雄傑」。凡此改動，皆可見賴襄作文推敲之苦心。以上所列，掛一漏萬。是故，今以日本明治十二年（1879）刊刻的賴襄《評點山陽遺稿・文》卷十所收〈《高江邨集鈔》序〉為底本，補以《高江邨集鈔》卷首賴襄序落款，將此序全文併近藤元粹（1850–1922）評點錄出（評點文字置於正文對應位置，並用圓括號標出），[154] 以供研究者參考。

〈《高江邨集鈔》序〉

余初讀高士奇《江邨消夏錄》，意士奇遭遇康熙，縱觀秘府圖書，蓋善於賞鑒者。今得其集，乃知其善詩。詩多應制，其涉書法畫理者，矜慎清貴，最中肯窾，非他人漫然副題者比，間波及古器物者亦然，皆可喜也。已而閱其扈從戎馬射獵之什，成於親踐，亦非如它人想像擬作，則又可喜矣。及觀其退居江邨，曲寫田園之樂，與家人婦子之情，則又大可喜矣。夫臺閣與山林，不可并者也，寶繪清閟與邊塞風沙，亦不可并者也。彼長則此短，自古為然。此集乃盡并而備之，雖隨其所歷，抑亦可謂奇已。（然則不倍名者乎？呵呵！）（論其詩境重疊，而出至篇末，一一收束之，結搆絕佳。）夫與士奇同時以詩名家者，莫若王士禛、朱彝尊。王蜀中諸詩，刻畫老杜；士奇之寫塞外山

[154] 《評點山陽遺稿・文》刻本已將點斷一併刻印，故此處斷句全依底本，不敢妄稱點校，以免掠美，惟個別誤字徑改而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莽蒼雄傑，似不多讓。朱之詠古跡長律，富麗森嚴云爾；士奇之〈過趙普故里〉，藏偶儷於流動，使人不覺其排，亦有過無不及。他多類此者。（一束。）後士奇而名焉者查慎行，更後焉者趙翼，皆有從軍律詩，視之士奇之渾老則少遜矣。（又束。）且士奇題是地，輒覈其廢置攻守皆鑿然，猶其於書畫也。（總束。）（「書畫」字先一顧，篇首妙。）此亦諸家所乏，然諸家各張壇坫，噪名一時，後人從而嗟歎之。而士奇寵畜禁林，寡交不近名，所以世不甚傳，傳亦以臺閣槩視之，未嘗細論爾。（漸入題意。）余故鈔而玩之，以示於彥根小野田舜卿，舜卿亦喜之，捐貲刊焉，使余序其由。抑余與舜卿之所喜，不獨其詩也。夫士奇早達，不由人薦引，出入密勿，前後十五六年。既罷復起，雖謗讒交攻，終得別白。說部或有載謗為實者，而《康熙實錄》可考焉。要之，其人必有足以結知於英主，外人不及知者。猶馬周、褚遂良之於唐太宗，唱和詩詞，鑒別圖書，特餘事耳。然因其詩，以按其履歷，推其為人之可知者。雖在館閣，常思抽身；（好句法。）雖在江湖，不忘報恩。（好句法。）不以閨閤之戚，墮金革之志；（好句法。）不以簪紱之榮，換菽水之歡；（好句法。）其出處進退，無愧為全人矣。（一頭而後總束。）（文勢如風雨，筆端有舌。）是其詩之所以能備諸體也，其詩之所以老而無衰也，而其所以不以詩名家也。不然，吾與舜卿平昔所相勗何事，而拮据於此等邪？天保辛卯夏六月九日，山易外史賴襄題。

附記：本文初稿完成後，曾請范景中、胡春麗、卿朝暉、樓培、丁欽馨五位師友審閱，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則為後續的修改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此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梁嘉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丁丙
《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第9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
《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王鍾翰點校
《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毛奇齡
《西河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方薰
《山靜居詩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咸豐六年《別下齋叢書》續刻本。
《山靜居畫論》,《續修四庫全書》,第10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永瑢等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阮葵生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茶餘客話》,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
《榕村語錄 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李佐賢纂輯
《書畫鑑影》,《續修四庫全書》,第108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吳省蘭輯
《藝海珠塵》,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間刻本。
吳振棫撰;童正倫點校
《養吉齋叢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
汪景祺
《讀書堂西征隨筆》,《續修四庫全書》,第117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昭槤撰;何英芳點校
《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奕賡撰;雷大受校點
《佳夢軒叢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秦瀛
《己未詞科錄》,《續修四庫全書》,第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高士奇
《江村書畫目》,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十三年《東方學會叢書》初集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獨旦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苑西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歸田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隨輦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經進文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高國楹等修;沈光曾等纂
《(乾隆十年)平湖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16冊,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2。
高輿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正一品又加二級顯考澹人府君行述》,國家圖書館藏清沈氏嘯園藍格抄本。
郭琇
《郭華野先生疏稿》,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雍正十三年刻本。
陸棻
《雅坪文藁》,上海圖書館藏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雅坪詩藁》,上海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陸隴其撰;楊春俏點校
《三魚堂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
《郎潛紀聞初筆 二筆 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黃宗羲著;吳光整理釋文
《黃宗羲南雷雜著真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曹雪芹、高鶚著;張新之評
《妙復軒評石頭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張力行纂修
《(乾隆四十五年)平湖縣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彭潤章等修;葉廉鍔等纂
《(光緒)平湖縣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徐鵬輯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葛金烺纂輯
《愛日吟廬書畫錄》,《歷代書畫錄輯刊》,第1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鈕琇
《臨野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趙翼、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
《簷曝雜記 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蔣良騏
《東華錄》，日本天保四年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刻本。
鄭方坤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間杞菊軒刻本。
蕭奭撰；朱南銑點校
《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賴襄著；近藤元粹評點
《評點山陽遺稿・文》，日本明治十二年刻本。
錢儀吉纂；靳斯標點
《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戴璐撰；施紹文點校
《藤陰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近人論著

E. M. 福斯特著；馮濤譯
2019《小說面面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E. M. Forster; Feng, Tao, trans.
2019 *Aspects of the Nove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丁原基
1983《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
Ding, Yuan-ji
1983 *Qingdai Kang Yong Qian sanchao jinshu yuanyin zhi yanjiu* (A Study on the Reasons for Book Prohibition in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of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Huazheng shuju youxian gongsi (Huazheng Book Co., Ltd.).
王汎森
2015《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Wang, Fan-sen
2015 *Quanli de maoxiguan zuoyong: Qingdai de sixiang, xueshu yu xintai (xiuding ban)* (The Capillary Effect of Power: Thought, Academia, and Menta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思治、李鴻彬主編
1995《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
Wang, Sizhi, and Hongbin Li, eds.
1995 *Qingdai renwu zhuangao* (Biographies of Qing Figures), First Series, vol. 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家儉
1992 〈崑山三徐與清初政治〉，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699-720。
Wang, Chia-chien
1992 "Kunshan san Xu yu Qingchu zhengzhi (The Three Xus of Kunshan and Early Qing Politics)," 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d., *Family Process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pp. 699–720.
王彩雲
1993 〈《滿漢名臣傳》的版本及其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期，頁48-49。
Wang, Caiyun
1993 "*Man Han mingchen zhuan* de banben ji qi jiazhi (The Editions and Value of *Man Han Ming Chen Zhuan*),"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 3, pp. 48–49.
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繼祖審訂
2000 《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
Wang, Qingxiang, and Wenli Xiao, coll.; Luo, Jizu (reviewer)
2000 *Luo Zhenyu Wang Guowei wanglai shux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毛姆著；黃福海譯
2015 《木麻黃樹》，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Maugham, W. Somerset; Huang, Fuhai, trans.
2015 *The Casuarina Tree*,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石守謙
2018 《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Shih, Shou-chien
2018 *Fengge yu shibian: Zhongguo huihua shilun* (Style and Transformation: Ten Essays on Chinese Paint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列夫·托爾斯泰著；婁自良譯
2010 《戰爭與和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Tolstoy, Leo; Lou, Ziliang, trans.
2010 *War and Peace*,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安·蘭德著；馮濤譯
2005 《致新知識分子》，北京：新星出版社。
Rand, Ayn; Feng, Tao, trans.
2005 *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Beijing: New Star Press.
那志良
2004 《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a, Zhiliang
2004 *Dianshou gugong guobao qishi nian* (Seventy Years of Guarding the National Treasure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李濬之編；毛小慶點校
2014 《清畫家詩史》，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Li, Junzhi ed.; Mao, Xiaoqing, coll.
2014 *Qing huajia shishi* (A Poet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Painters),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吳嘉龍
2023 〈出版、閱讀與知識傳播——以《江村銷夏錄》為個案的研究〉，《中國出版史研究》，2期，頁78-97。
2025 〈論《江村銷夏錄》之流傳與閱讀》〉，《中國書畫研究集刊》，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7-106。
2025 〈高士奇書畫鑒藏編年事輯〉，《中國四庫學》，第15輯，長沙：岳麓書社，頁255-325。
Wu, Jialong
2023 "Publishing, Reading,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 Cun Xiao Xia Lu*,"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China*, no. 2, pp. 78–97.
2025 "A Study on the 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Jiangcun Xiaoxia Lu," *Journal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tudies*, no. 5,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pp. 77–106.
2025 "Gao Shiqi shuhua jiancang biannian shiji (A Chronological Compilation of Events in Gao Shiqi'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 and Collection)," *Zhongguo siku xue* (Chinese Siku Studies), no. 15,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pp. 255–325.
余紹宋撰；戴家妙、石連坤點校
2012 《書畫書錄解題》，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Yu, Shaosong; Dai, Jiamiao, and Liankun Shi, coll.
2012 *Shuhua shulu jieti*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ooks o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沈松僑
1997 〈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期，頁1-77。
Shen, Sung-chiao
1997 "The Myth of *Huang-ti* (Yellow Emper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hood in Late Qing,"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28, pp. 1–77.
辛德勇
2013 〈從清宮秘藏到日本官板——記和刻本蔣氏《東華錄》〉，收入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編，《宮廷典籍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Xin, Deyong
2013 "From Secret Qing Court Treasures to Japanese Official Editions: A Record of the Hekeben (Japanes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Jiang's Donghua Lu*," in The Institute of Gugong Studies at the Palace Museum,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urtly Texts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Exchanges*, pp. 13–37.
林夕
1991 〈關於《絕妙好詞》〉,《讀書》, 11期, 頁44-48。
Lin, Xi
1991 "Guanyu *Jue Miao Hao Ci* (On *Jue Miao Hao Ci*)," *Du Shu* , no. 11, pp. 44–48.
孟森
1959 《明清史論著集刊》, 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心史叢刊》, 北京：中華書局。
2007 《清史講義》, 北京：中華書局。
Meng, Sen
1959 *Ming Qing shi lunzhu jikan* (Collected Works on Ming and Qing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Xinshi Congka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Xin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Qingshi jiangyi* (Lecture Notes on Qing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胡春麗
2021 《毛奇齡年譜》,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2 〈《高士奇年譜》補正〉,《中國詩學研究》, 第21輯, 南京：鳳凰出版社, 頁218-253。
Hu, Chunli
2021 *Mao Qiling Nianpu*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ao Qiling),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Gao Shiqi Nianpu* bu zheng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to *Gao Shiqi Nianpu*),"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vol. 21,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pp. 218–253.
俞劍華
1937 《中國繪畫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
Yu, Jianhua
1937 *Zhongguo huihua shi*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宮崎市定
1991 《宮崎市定全集14：雍正帝》, 東京：岩波書店。
Miyazaki, Ichisada
1991 *Miyazaki Ichisada zenshū 14: Yoseite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iyazaki Ichisada, Volume 14: Emperor Yongzheng), Tokyo: Iwanami Shot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徐邦達
1981 《古書畫鑑定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
Xu, Bangda
1981 *Gu shuhua jianding gailun* (Introduction to the Appraisal of Ancien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倉修良
2014 《方志學通論（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Cang, Xiuliang
2014 *Fangzhixue Tonglun (zengding ben)*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ocal Gazetteer Studie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陳徒手
2013 《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hen, Tushou
2013 *Ren you bing tian zhi fou: 1949 nian hou Zhongguo wentan jishi (xiuding ban)* (If People Are Ill, Does Heaven Know?: A Documentary Record of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after 1949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陳捷先
2011 《康熙大帝：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皇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Chen, Jie-xian
2011 *Emperor Kangxi: The Most Outstanding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陳清雲
2016 《趙翼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Chen, Qingyun
2016 *Zhao Yi nianpu xinbian* (A Newly Compiled Chronology of Zhao Y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孫靜庵編
1913 《棲霞閣野乘》，上海：中華圖書館。
Sun, Jingan ed.
1913 *Qixia ge yecheng* (Unofficial Records from the Qixia Pavilion), Shanghai: Zhonghua Library.
黃裳
1982 《榆下說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9 《前塵夢影新錄》，濟南：齊魯書社。
Huang, Shang
1982 *Yuxia shuoshu* (Essays on Books under the Elm Tre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9 *Qianchen Mengying Xinlu* (New Records of Dreamlike Shadows from Bygone Days), Jinan: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

曹南屏

2017〈清代科舉的知識規劃、考試實踐與士子群體的知識養成〉,《學術月刊》,9期,頁145-160。

Cao, Nanping

2017 "Civil Examinations and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among Literati-elites during Qing Dynasty," *Academic Monthly*, no. 9, pp. 145–160.

啓功

1999《啓功叢稿:題跋卷》,北京:中華書局。

Qi, Gong

1999 *Qi Gong conggao: tiba juan* (Collected Manuscripts of Qi Gong: Volume of Colophons and Prefac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張宗友

2020〈文士之交與祿利之爭:朱彝尊「美貶」考〉,《古典文獻研究》,第23輯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頁205-225。

Zhang, Zongyou

2020 "Wenshi zhi jiao yu luli zhi zheng: Zhu Yizun 'mei bian' kao (Relationships among Literati and Struggles for Emolument and Profit: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mmendation and Censure' of Zhu Yizun),"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vol. 23, no. 1,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pp. 205–225.

張珩

1966《怎樣鑒定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

Zhang, Heng

1966 *Zenyang jianding shuhua* (How to Apprai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葉恭綽撰;李軍點校

2019《遐庵清秘錄 遐庵談藝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Ye, Gongchuo; Li, Jun, coll.

2019 *Xiaan qingmi lu / Xiaan tanyi lu* (Records of Refined Treasures from Xia'an / Discourses on the Arts from Xia'an), Shanghai: Shanghai Painting &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馮爾康

2005《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Feng, Erkang

2005 *Qingdai renwu zhuanji shiliao yanjiu* (Research on Biograph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Qing Dynasty Figures),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仁愷
2000《中國書畫鑒定學稿》，瀋陽：遼海出版社。
Yang, Renkai
2000 *Zhongguo shuhua jianding xuegao* (Draft Study on the Appraisal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henyang: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楊仁愷主編
1990《中國書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Yang, Renkai, ed.
1990 *The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楊仁愷編著
1991《國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Yang, Renkai, ed.
1991 *Guobao chenfu lu—Gugong sanyi shuhua jianwen kaolüe* (Record of the Vicissitudes of National Treasures: An Investigative Account of Los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楊啟樵
2003《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增訂第三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Yang, Qiqiao
2003 *Yongzheng di ji qi mizhe zhidu yanjiu (zengding di san ban)* (A Study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and His Secret Memorial System [Third Enlarge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鄧之誠
1965《清詩紀事初編》，北京：中華書局。
2012《骨董瑣記全編：新校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Deng, Zhicheng
1965 *Qingshi jishi chubian* (Chronicles of Qing Poetry, First Se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Gudong suoji quanbian: xinjiao ben*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iscellaneous Notes on Antiquities: New Collated Edi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歐陽健
2022《茶餘客話》版本論考〉，《全清小說論叢》，第1輯，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30-251。
Ouyang, Jian
2022 "*Chayu kehua* banben lunkao (A Study on the Editions of *Cha Yu Ke Hua*)," *Quan Qing xiaoshuo luncong*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Complete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vol. 1,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30–2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魯迅
2005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Lu, Xun
2005 *Lu Xun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潘光旦
1947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上海：商務印書館。
Pan, Guangdan
1947 *Ming Qing liangdai Jiaxing de wangzu* (Prominent Clans of Jiax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錢存訓
2002 〈精寫本《江村書畫目》題記〉，《文獻》，3期，頁144-146。
Tsien, Tsuen-hsuin
2002 "Jingxie ben *Jiangcun shuhua mu* tiji (A Note on the Fine Hand-Copied Edition of *Jiangcun shuhua mu*)," *Wenxian* (The Documentation), no. 3, pp. 144–146.
錢穆
1998 《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Qian, Mu
1998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Mr. Qian Mu),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謝正光
2021 《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Xie, Zhengguang
2021 *Qingchu zhi yimin yu erchen* (Loyalists and Turncoat Official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羅振玉
2013 《松翁近稿（外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集蓼編（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Luo, Zhenyu
2013 *Songweng jingao (wai shi zhong)* (Later Manuscripts of Songweng: with Ten Additional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2013 *Jiliao bian (wai ba zhong)* (Collected Works of Ji Liao: with Eight Additional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盛吉
2014 〈《嘯亭雜錄》版本比較初探〉,《滿語研究》,1期,頁22-27。
Luo, Shengji
2014 "The Contrast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Xiao Ting Za Lu*," *Manchu Studies*, no. 1, pp. 22–27.
竇瑞敏
2017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足本考略〉,《古籍研究》,1期,頁115-123。
Dou, Ruimin
2017 "*Guochao mingjia shichao xiaozhuan* juben kaolüe (A Brief Examination of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Guochao Mingjia Shichao Xiaozhuan*)," *Guji Yanjiu* (Research on Ancient Texts), no. 1, pp. 115–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Long Goodbye—— A Study of Gao Shiqi as a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 Represented Image

Wu, Jia-long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Guo Xiu's *Te can jin chen*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accounts concerning Gao Shiqi's character and conduct, and its evaluation of Gao Shiqi's moral integrity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his image in later genera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Guo Xiu's critique of Gao Shiqi and Gao Shiqi's social inter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his retirement, demonstrating that his reputation among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not as negative as commonly assumed. Furthermore, by analyzing later biographical records, literary sketche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Gao Shiqi, as well as tracing the formation of these sources, this study aims to clearly delineate the framework and factors that constructed Gao Shiqi's historical image.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o Zhenyu's political stance and his criticism of Gao Shiqi, while elucidating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criticism on the research of later connoisseurship and collecting histor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Keywords: Gao Shiqi, Historical Image, Guo Xiu, Luo Zheny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nnoisseurshi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